



亚 | 洲 | 道 | 路

上海论坛2015嘉宾采访录



www.shanghaiforum.org



电子邮箱：shanghaiforum@fudan.edu.cn

复旦大学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在 上海论坛 2015 上，我们招募了 23 位优秀的复旦学生担任记者对论坛嘉宾进行采访。他们用专业、投入和自信记录下这些智慧之声。这本采访录，就是他们与嘉宾交流观点、汇集智慧的结晶。」

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诚挚地感谢每一位莅会嘉宾和每一名学生记者。我们希望通过本书，与更多关心亚洲发展的同仁们，共享思想与智慧的力量。」

2015 上海论坛学生采访团名录

姓名	院系
CHEUNG Choy-Fun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陈宇婷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GAGEN Katherine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韩政	法学院
胡京晗	基础医学院
金忆茗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刘夕铭	法学院
仇晟栋	法学院
邵一帆	外文学院

史晋星	经济学院
田云茹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王丹妮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王彦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王震宇	新闻学院
谢欣辰	经济学院
邢妍菁	经济学院
徐佳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晔	新闻学院
杨梦羽	数学科学院
曾济人	化学系
张昕蕊	经济学院
赵迪	新闻学院
左小雨	新闻学院

目 录

智者对话

- | | | |
|-----|---------------------|-----------------------|
| 001 | Fabrizio Saccomanni | 欧洲经济现状与国际合作中的亚欧互补关系 |
| | - 陈志敏 | |
| 007 | Myron Scholes | 高科技时代的愿景：商业、经济和教育的新模式 |
| | - 张军 | |
| 014 | 吴建民 |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
| | - 吴心伯 | |
| 020 | Vladimir Yakunin | 铁路运输发展对于中俄合作意义重大 |
| | - 赵华胜、沈逸 | |

高端访谈

- | | | |
|-----|----------------|-------------------------------|
| 025 | 蔡泳 | 中国需重建社会制度以走出生育率陷阱 |
| 029 | Ben Cashore | 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治理：方法和可能性 |
| 034 | 陈波 | “自贸区”应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摸索制定高水平的游戏规则 |
| 039 | Maggie Chen | 创新是关键：亚洲和中国的未来十年 |
| 045 | 程保志 | 加入北极理事会后，中国如何有效参与北极事务 |
| 049 | CHUNG Chul | 期待更深层次的自由贸易合作 |
| 053 | Aaron J. Cohen | 大气污染：如何在更清洁的战略下实施发展？ |
| 058 | 丁利民 | 用社交媒体更好地实现政民沟通和为民服务 |
| 062 | Shukmei Ho | 环境问题：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公民之间的交锋 |
| 065 | Frank Jannuzi | 催化和支持作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 |

073	江源富	数据开放要配合制度和法律的并行完善
078	李新玉	中国城市外交应整合资源, 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
082	Jungho Nam	北极冰融背后的风险与机遇
087	Michael Schmidt & Arno Bokeloh	欧洲经验: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该何去何从
094	Niels Thygesen	欧洲和中国的互动及合作将会稳步增加
098	王小军	城市创新: 向人力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转变
103	Colin Wight & Toni Erskine	R2P 的维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111	邢广程	理性看待“亚投行”背后的大国博弈
114	杨翠红	提升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是一个长远过程
119	由冀	网络空间安全归根结底是军事安全
123	余宏杰	公共健康亟需公众参与
126	张志安	塑造自由、理性、对话、共识的互联网舆论生态

欧洲经济现状与国际合作中的亚欧互补关系

编辑整理：徐佳唯



Fabrizio Saccomanni

意大利前经济财政部长



采访人：**陈志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
事务学院院长

「我们可以实现双方方法上的整合，现在正是合作共同促进国际基建投资的好时机。我希望双方能一直对基建投资这一理念进行推广实施，尤其是要将基础建设和技术创新联系在一起。」

陈志敏：萨科曼尼先生，欢迎来到上海论坛，我很高兴能够在上海继续我们的谈话。您曾担任意大利财政部长，并深入参与了欧洲经济挑战的管理。相信您对现在的欧洲经济现状一定有很多想谈的。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希腊问题，希腊政府正在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新的纾困协议进行谈判，现在的希腊政府一定希望能够结束部分经济紧缩政策，同时希望能得到新的国际贷款。所以基于您的观察，您如何评价此次谈判的进展，能否避免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情况？

Fabrizio Saccomanni: 我认为现在已达成的共识是，希腊若退出欧元区不仅对希腊不利，对整个欧元区来说也是不利的。现在各方正在尽全力寻找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希腊政府需要有更好的方案来调整计划。因为之前的计划并不可靠，让希腊的底层民众付出很大代价，给人的印象是富人并没有为解决希腊问题做出什么贡献。而现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包括意大利，也赞同希腊政府应当规划出一个新的欧元区计划，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目前该计划并不具体，只有几条通项。当前双方都在加紧达成共识，我也相信未来将会产生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但正如你所说的，目前希腊急需更多国际贷款，我认为他们也必须准备一个切实可行的改革计划。

陈志敏: 所以，您对找到这样一种解决方案持乐观看法？

Fabrizio Saccomanni: 我相信各方都希望避免最坏的情况，而目前双方都期待对方会在最后时刻做出较大让步，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双方若想真正取得进展，必须重视并尽早拿出解决方案。

陈志敏: 对于欧洲整体而言，自从2009欧债危机之后，欧盟一直致力于建立应对危机的必要机制，现在有了这些方法和机制，您认为欧元区国家现在有能力在今后避免类似的大规模金融危机？

Fabrizio Saccomanni: 我对欧洲能够避免大规模金融危机很有信心。正如你所说的，欧盟已经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并建立了欧洲稳定机制（ESM），对包括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塞浦路斯在内的5个重债国提供了金融救助。欧洲稳定机制融资总额超过2000亿欧元，加上其他资源总共可以动员7000亿欧元。且现阶段正在推进建立欧洲银行联盟，创建欧洲央行监管下的单一监管机制，这将为所有欧洲银行提供金融保障。欧洲央行也最终通过并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些措施都能保障欧洲国家有机制与能力来预防未来的债务危机，并促进现阶段经济恢复性增长。最新的经济数据表明，几大欧盟国家已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复苏迹象，不只是德国，也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这意味着欧盟正在逐渐走出欧债危机。欧洲没有一个单一的

政府，至少在经济政策上没有一个单一政府，也正是这一原因使得欧债危机变得十分复杂，但现在统一由欧洲央行制定货币政策，也出现了应对欧债危机的欧洲稳定机制，而现阶段，欧洲稳定机制将会为欧盟国家的金融现状稳定化提供强大的援助并促进经济增长。

陈志敏：这是个好消息。但现阶段还有一个复杂的因素，也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的较量中，欧盟已经对俄罗斯实行了一些经济制裁。您如何评价这些制裁，不仅从对欧洲经济的影响角度，也从所谓的“试图改变俄罗斯政策的有效性”角度考虑？

Fabrizio Saccomanni：这对于欧洲来说主要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对俄实施经济制裁无疑会对许多欧盟国家造成影响。从经济角度而言，前几轮经济制裁对于欧盟国家的影响很严重，当然也包括意大利。意大利和俄罗斯曾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对俄经济制裁对意大利的影响是消极的，也正是因此，我们希望乌克兰冲突各方能够重新开启谈判，各方能够互相了解并共同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我认为俄罗斯也必须接受如果希望能在国际社会继续保持合作伙伴关系，他们必须在行动上做出改变。我在担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副行长时了解到乌克兰的局势十分难管理，因为乌克兰国内有较大分歧，分为亲欧和亲俄两派。乌克兰想要保持国家统一就必须要有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而这一点是非常难实现的。

陈志敏：根据最近几天的新闻，我认为对于意大利甚至对于欧盟来说最大的挑战可能是来自北非，特别是来自利比亚的非法移民。而最近欧盟也做出了决定，在地中海发起军事行动，拦截走私移民的船舶，还提出要在公海上甚至是利比亚海岸边捕获或击沉走私船，请问您如何评价这些提议？此外，大量非法移民已经到达了意大利，意大利将会如何处理这些移民？

Fabrizio Saccomanni：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欧盟各国已达成共识，任何针对利比亚的干预行动的升级必须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虽然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已达成了一致结论，但具体实施只有在联合国安理会达成积极结论

后才能实现。目前，欧盟外交官也在与中国、俄罗斯、美国合作，来商定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启动有关针对利比亚的干预行动，所以在现阶段我不能对这些正在商讨的细节做出评论。实际上，许多人贩子正在重新利用船舶来完成对非法移民的往返运输。对于第二个问题，现在很难判断已到达意大利的移民是否非法，这个问题也不在我了解的专业领域内。但是，据我了解，许多来到意大利的移民离开原来的国家是为了摆脱贫穷或躲避战火，很多非法移民来自于叙利亚、苏丹等国家，这些国家局势不稳定，冲突和战争频发，所以很难决定这些移民是否非法。拒绝这些非法移民也出于一种担心，即这些移民中可能有来自ISIS等恐怖组织的成员，所以我们必须格外谨慎。我认为加强与法律部门的合作十分重要。问题是现在利比亚有两个分立的政府，一个控制着西部，另一个控制着东部。除非双方达成协议共同监督海岸现状，不然很难商讨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现在联合国和欧盟各国也达成了共识，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进展，因为最初的认识是这些移民都去了意大利，所以非法移民问题只是意大利的问题。但实际上，很多移民都希望到别的国家“投靠亲戚”，意大利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中转站。因为从地理上来说，意大利距离北非海岸只有80英里，所以它是这些移民们的普遍目的地。但现在欧洲对于这个问题已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不只是意大利的问题，也是关系各国的问题，来到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的移民都想最终到别的国家安顿下来。

陈志敏：下面我有几个问题，可能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继英国之后，意大利决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就是亚投行（AIIB），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促使意大利做出加入亚投行的决定？亚投行又应该在亚洲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Fabrizio Saccomanni：首先，意大利选择加入亚投行是因为建立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机构是一个很好的概念，长期以来在基建方面的投入不足一直是世界性的问题。从马可·波罗时起，欧洲人就已经意识到中国与欧洲距离并不遥远，能通过亚洲将欧洲与中国联系起来的投资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亚洲还有部分贫困地区，亚投行能为这些地区带来刺激经济的投资并促进现代化建设。因为我认为基础建设投资大多集中在高新科技领域，涉及交通、

电信、能源、产量分配等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应对一些国际性的问题。我也有幸会见了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并讨论过这件事情，我的理解是亚投行将不会和世界银行或亚洲发展银行构成竞争关系，而是在现阶段建设基础上起补充的作用。目前，欧洲也正在着手基础建设投资基金的建设，这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先生推出的新计划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们双方可以实现一种方法上的整合，现在正是一个合作共同促进国际基建投资的好时机。我希望双方能一直对基建投资这一理念进行推广实施，尤其是要将基础建设和技术创新联系在一起，做一些实事来增强经济活力，帮助经济复苏。

陈志敏：今天下午，我们在一个研讨会上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希望您可以给我们一点答案，即如果英国没有宣布加入亚投行，欧洲其他国家是否会决定加入亚投行？

Fabrizio Saccomanni：就我所知，各国关于亚投行的谈判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中国方面也是几乎在同一时间将此重要消息通知了几大欧洲国家。我们原计划该问题将会于今年5月底在德国举办的G7财长会议中进行公开讨论，而英国则在会议前已宣布其决定。这可能也与英国国内政治原因——大选——相关。意大利宣布加入亚投行并不令人意外，宣布最终决定只是一个时机问题，并不会因为英国的决定而改变想法。这只是一个时机问题，而英国选择走在最前面。

陈志敏：除了亚投行之外，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名为“丝绸之路”的倡议，从您的角度，您如何评估欧洲对中国这些倡议的反应，欧洲的基础建设投资项目是否与中国这项提议有着一些真正实质性的重叠或融合，我们是否可以整合或协调这些部分并促进双方发展？

Fabrizio Saccomanni：我对这个问题的印象是，在整个国际社会，基础建设投资不足的一个原因是私人投资者普遍偏好短期股权投资，他们认为基础建设的投资风险相对较大，因为其时间长、不确定因素大，经济和政治状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同时私人投资者想要了解与投资相关的监管制度，他们也一直在强调监管安全的重要性，他们会想要了解哪方将会决定电力价格、

油气分配、网络等等。我认为目前世界范围内，相关的风险管理这一块做得还不够。在基建投资的相关倡议中，亚洲和欧洲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因为亚洲国家对亚洲现状比较了解，而欧洲国家则对欧洲现状更为擅长，包括了对东欧的了解，因为通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我们已经在那里开展了一系列项目。我认为互补性是十分关键的，需要对每个项目进行较好的评估，对其执行进行监管。亚欧必须一同努力，让所有相关的机构都加入进来，同时也必须提供一定等级的监管安全保障，以保证项目执行时间，以及在后期不会有其他的补充和修改等。我们需要从这一点展开努力，而要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需要大量经验的整合。而这带来的反响将会是积极的，因为会受到私人投资者的支持，私人投资者现在从投资中能获得的收益很低，而更长期的投资能够带来更大的利益。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找到办法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即投资较少和投资者获利较低。我们可以尝试将长期投资、高效执行和安全等级高结合在一起。

陈志敏：意大利可以在中国的这些倡议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Fabrizio Saccomanni：意大利已经参与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项目，并且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中过标。我相信意大利掌握了许多相关的专业知识，从这点出发我们还能在一些之前提过的一些新方法中提供帮助。在欧洲的相关机构中，意大利能够提供一些新的意式方案。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意大利承包商和企业参与到国际基建项目，如道路、水坝、桥梁的建设中去。

高科技时代的愿景：商业、经济和教育的新模式

编辑整理：杨梦羽



Myron Scholes

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斯坦福大学Frank E. Buck金融学荣誉教授



采访者：**张军**

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新技术会造就新的经济状况，包括个性化、灵活性和速度的加快。」

张军：每次我飞到美国，我都在想旅程实在是太长了。另外，经常需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来适应时差。所以，有时候我喜欢在线工作或谈话，而不是实际到达现场。昨天，上海这里的一位企业主告诉我，他的公司正在开发一个在线通信平台，该平台将美国的医生与中国的患者联系起来。在中国人越来越富有的时候，他们也希望享受到在美国的高水平医疗服务，但是要是真去美国治疗的话，花费又太高了。所以，公司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并建立这样一个平台来实现利润。但是现在，他们急切地想要知道，我们能否真的通过互联网实现联系？

Myron Scholes: 我想这个想法我们已经实现了。我的一个朋友就有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在美国境外的医生身边工作，照看患者，然后将所有的信息传送给在美国境内办公的医生。这意味着，两个医生可以一起为一个患者进行治疗。我们已经可以通过使用机器人来实现这样的连接。

张军: 现在机器人在一些富裕的中国家庭里非常受欢迎。因为这些家庭的子女经常会离家工作，他们年长的父母就要独自在家生活。而这些子女仅仅需要把机器人放在家里，然后就可以很好地照看他们父母的生活状况。

Myron Scholes: 由于我们将进入老龄化社会，所以我们需要想出儿女们如何照顾他们的父母的办法。机器人将可以成为很好的“儿女”，来陪伴老人们并照顾他们。

张军: 我听说您非常热衷于高新技术产品。那么，您对从现在起十年后的尖端技术发展怎么看？

Myron Scholes: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认为，新技术会造就新的经济状况，包括个性化、灵活性和速度的加快等。所以，通过互联网在商业中的作用，我相信，市场将从卖方市场转换到买方市场。客户都希望个性化定制他们想要的产品，这一点为制造商和商人如何制造和经销其产品带入了更大的灵活性。在我看来，商业网络的发展实际上在于：信息高速公路将被用于帮助商人更高效地为其客户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并满足其个性化需求。这就是未来的情况。

张军: 而解决方案提供商将会控制模块化生产，而这实际上是与现在的批量化生产不同的。在批量化生产的情况下，厂家通过进行标准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就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现在，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客户需要厂家提供的个性化的定制产品。

Myron Scholes: 这正是客户想要的。这将会给我们带来彻底的改变。我

相信，世界将会从交易处理模式转向交易分析模式。这种转变将如何改变经济、生产或者甚至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商人来说，拥有信息高速公路并理解交易顺序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他们需要有能力来使用他们所得到信息。通过这些知识与信息，商人可以更加高效地销售产品和服务。这里有一个区块链。信息高速公路和交易顺序将帮助验证贸易和交易，并为商人和客户创造互动渠道，以此来更加高效地进行商业活动。我们是否能够想出有效克服交易中种种障碍和问题（例如运输问题）的方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拥有多少信息。而我们拥有的信息越多，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将会越好。

同时，我认为，区块链概念的发展意味着未来将会有不可思议的变化。可以预想的是，区块链将使得全球的信息流更加灵活，并打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银行垄断、信用卡垄断等等。当你打开互联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非常多的创新。人们可以在网络空间内进行创新和创造。我的观点是，金融和经济，以及在这个领域内的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有其是令人惊喜的一面，可以使金融运行更加高效。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但是我同时也认为，我们将会看到，随着技术、机器人和创新的使用，将会出现大量的网络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

而有关于产品规格，很多年前，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在加拿大的一个百货商场工作。而在那里工作的矿工们，只能买到一种鞋码的靴子。所以鞋号小一些的矿工们只能将袜子塞进靴子里。而鞋号大一些的矿工们却几乎没办法走路了，因为靴子太紧了，他们根本穿不上。所以，当有人想出了新点子，开始生产和销售大、中、小三种规格的靴子，他们的生意立刻做得有声有色，销售利润远远超过其他商场。而现在，我的鞋码已经具体到43.6码。而在将来，我左脚的鞋和右脚的鞋，可能是不一样的鞋码。可能我左脚穿43.5的鞋，因为左脚大一些，而右脚穿43.4的鞋。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会越来越个性化。创新和生产的模式都将会改变。我们有相关的研究和开发，但是将不会只是在实验室中测试了。我们应该不断的学习和创造，并且需要获得反馈。创新将不仅仅在技术领域内发生，不论是在中国、美国、欧洲还是日本，创新还会在有效反馈和有效学习的基础上进行。

张军：您是否相信新技术，例如3D打印机，将会改变传统生产模式？

Myron Scholes: 目前的一些新技术非常了不起。北京有世界上最大的3D打印设备。而现在，该设备正在打印飞机零部件，例如机翼和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你可以让这些东西变得更轻，而同时让其变得更加的结实。这些部件应该结实一些。

远程医疗是一个不错的概念，并且是医疗领域内技术应用的最高效的例子。在老龄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将会在我们照顾老龄人口的方式方面看到更多的进步。同时，还有一些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如何使用传统的自然资源（例如水资源），如何使用太阳能等新能源，将会变得非常重要。如果能够以正确的方法使用资源和技术，效率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同时，我认为教育的方式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看一下远程教育的奇迹。我们实际上让数以十亿计的在无法接受教育的地方的人口接受了教育。这是一个奇迹般的变化，人们需要这个。而现在，例如在印度，受教育率已经达到了10%。

张军: 10%。这和中国的受教育率比起来差距太大了。

Myron Scholes: 中国的受教育率是80%。在印度，在800,000教师中只有1%是合格的教师。所以如果你想要将社会发展带入一个充满创新和创意的世界，那就需要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更好的教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远程教育。我希望整个教育系统都将发生改变，变得更加的个性化，而不是以一种方式提供所有人的教育。

如果我们通过远程教育定制教育，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并不断提高人才的价值。因为我相信，智慧不是固定的。我们中的许多人相信，我们生来就带有一定水平的智慧。我不认为这是真的。智慧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成长的。你变得更加聪明了是因为你在学习。

张军: 您是否认为在印度实施远程教育会比较困难？

Myron Scholes: 是的。不过现在很多人都有手机。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手机进行教育。我们在非洲有一些互联网教育的案例。他们没有老师，没有教科书，什么也没有。但是他们有一台电脑。学生、儿童，所有人都围在电脑

旁边去学习。所有人都想要学习。那么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使用互联网，以及我们如何使用手机。我们需要将机动性纳入到考虑范围内，并把所有人都能有一部智能手机这种观念纳入到考虑范围中。有些人一天只能赚2美元，但是都在使用手机。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他们每个月要支付大约10美元的手机费。

张军：我听说您在高中时代就购买过股票。这让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并没有想到那么年轻的学生就已经能够买股票了。

Myron Scholes：实际上我出生在加拿大一个叫做Timmins的地方，在那里有许多价格很低的股票，所有当时在股票市场中有很多投机行为，而那些人实际上都在赌博。我不赌博。但是我开始对股票感兴趣，并开始考虑其在经济学方面的价值。我之所以对金融产生了兴趣，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在那时候经常观察人们在股票市场中的行为。

张军：您在麦克马斯特大学所选的专业是什么？

Myron Scholes：在麦克马斯特大学，我选了数学和经济学专业，主修数学。当我从麦克马斯特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实际上并不清楚我想要做什么。在1962年我去了芝加哥大学，做了一个暑假的计算机程序员，和做计算机工作的教授们一起工作。他们发现我拥有很好的想法，所以他们就给了我博士奖学金。

张军：那么，您的导师是Eugene Fama吗？

Myron Scholes：不是的，我的导师是Merton Miller。我与Merton一起做了许多研究和工作的，所以实际上Merton是我的导师。Eugene在那时候更像是一个同龄人。他比我大几岁，但是我跟他一起工作，与他交流，而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经济学家。

张军：您什么时候意识到期权模型会转变我们对资产定价的概念？因为

之前所有的有关于资产定价的概念都与风险溢价或多或少的有关。看起来您并不相信这是正确的方法。我很好奇您什么时候意识到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创新。

Myron Scholes: 可能是我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工作之后。在那时候，我正跟我的学生一起工作，他们将期权带入了市场中，而我开始涉及到期权定价的问题。而且我也在考虑期权的动力及其变化，这让我感到很兴奋，因为风险是在改变的。

我与Fisher Black谈了很多，因为他同样也在那个时候研究期权模型。所以我们一起进行了研究，发展了这套理论。而有趣的事情是，在1971年公式列出来了，直到1980年才被用于研究在芝加哥或纽约的期权交易所的证券。换句话说，在1980年，投资银行开始改变其设计产品的方法。这创造了金融革命。

张军: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Black-Scholes公式被认定为改变世界的17个公式之一。但是我听说，在一开始，您的论文被不同的杂志退稿了好几次。那么，最后是怎么在法律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的呢？

Myron Scholes: 因为人们发现这个公式最初有些过于抽象，所以我们进行了解释，并对公式进行了证明。

张军: 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个公式？您认为它是过于简单还是过于复杂？

Myron Scholes: 公式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过于复杂，所以人们并不理解这个公式。但是同时，这个公式是很不寻常的，因为这个公式是在无需知道未来市场中期权精确回报的前提下对该期权进行定价的方法。

张军: 我知道在1997年，您与Robert Merton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您的模型和Robert Merton的模型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联系？

Myron Scholes: 其实我是和Fisher Black一起开发出这个模型的，但是很

遗憾，他在我获得诺贝尔奖的两年前去世了。我们的模型为定价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而Robert Merton在我之后又给出了另外一个解决方案，该方案就是通过我们所没有使用的连续时间数学增强对事务的解释。但是我依然偏好于离散时间方法，这能够让我们获得更大的灵活性。

张军：您能否谈谈您现在的研究？

Myron Scholes：我最近关注与动态风险管理。我正在考虑动态风险是什么，以及如何管理风险。我希望找出其是如何变化的，并如何使用该信息。我尝试为其建模，并将其应用在如何管理资产组合中。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编辑整理：金忆茗



吴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驻法大使
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采访人：**吴心伯**

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是要继承过去，又有发展。继承过去的两点非常明确：第一，看准时代。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一变化意味着解决了当时世界面临的主要困境。我们的方针与世界是一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发展合作，在双方利益交汇的基础上开展项目，合作共赢。第二，坚持和平发展。」

吴心伯：吴大使您好，欢迎您参加2015年上海论坛，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从去年以来，我们都在谈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您作为中国外交战线的一员老将，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吴建民：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是习近平主席去年11月29号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我认为提得很及时，有两个原因：第一，从中国来看，我们现在接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这可能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际地位最高的时候。过去一百多年时间，我们在世界舞台的边缘，这就谈不上是大国外交。第二，你既然接近中心，世界也期待你发挥作用。因为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变化的时候，我们应当建立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去年十月份我到纽约，跟基辛格一起吃饭聊天，他写了本新书《世界秩序》。他提出来，现在世界上对此议论很多，大家也在期待中国发声，中国的主张到底是什么？因此，我觉得提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是适时的。

吴心伯：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跟建国以来中国的外交，它们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又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新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外交？

吴建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外交从1949年到现在大体有两段：改革开放前是一段，改革开放后又是一段，两段的情况不一样。

改革开放前这一段，从中国的外交来讲，我们认为当时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把支持世界革命放在第一位。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听中央领导讲过，外交和革命发生矛盾的时候，外交服从革命。中国革命得到人家的支持，我们也支持人家的革命，我们还主张世界革命，这是当时的思想。新中国是一个新事物，当时的中国外交政策、外交目的就是要求生存。

1978年以后，中国外交方向随着国内战略方针进行调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外交也由求生存改为求发展。求发展就是要世界和平，之后邓小平几大动作，中美建交，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苏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访问了五个邻国：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目的是到邻国跟他们讲清楚，我们坚持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家要合作。还有港澳顺利回归，这几个大动作使中国外交赢得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这就非常成功。

我认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是要继承过去，又有发展。

继承过去的两点非常明确：第一，看准时代。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

变为和平与发展，这一变化意味着解决了当时世界面临的主要困境。我们的方针与世界是一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发展合作，在双方利益交汇的基础上开展项目，合作共赢。第二，坚持和平发展。这里有三要，三不要：一要和平，没有和平怎么发展？二要发展，很多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三要合作，中国现代化不能关起门来。还有三不要：一是不扩张，不重蹈西方大国殖民扩张的覆辙；二是不称霸，不学昔日苏联同美国称霸；第三，不结盟，中国不同任何国家结盟。1955年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第六项，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里面就是不结盟的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讲的也是这个。所以，不结盟是从我们那时候继承下来的，总结了共和国成立后与苏联结盟的失败教训，中国今后不能同任何国家结盟。

发展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还要考虑到世界，考虑到中国，考虑到利益。时代的主题变了，这是考虑到世界；中国现在以经济利益为中心，要实现全面小康，这是考虑到中国；将中国的利益和世界根本利益结合起来，这是考虑到利益。

吴心伯：您刚才讲到，把握时代格局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中国一般讲究要顺势而为，那么，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面临的有利条件有哪些？

吴建民：第一，什么是顺势而为？时代主题变化后，世界形成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9·11十周年前夕，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我，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是9·11的最大受益者，过去十年，中国发展多好，我们就顾着打仗了。”我回答说，你第一句话我不同意，我们不是最大的受益者，关键在我们顺应了这股潮流，你们逆了这股潮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过去了，你们还在打仗，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结果是越打越乱，你们逆了这股潮流。而中国顺了这股潮流，我们过去三十年大发展就是顺了这股潮流的结果，我觉得我们必须继续顺势而为。

第二，我们面临哪些有利条件？第一，今天的世界有一套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譬如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做的东西能卖出去，我们也要买进别人的东西。第二，亚洲正在崛起，我们正处在亚洲。战后亚洲崛起经过

了五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日本，它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第二个浪潮，六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第三个浪潮，七十年代的东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这几个国家发展起来了；第四个浪潮，中国，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加入了发展的大潮；第五个浪潮，1991年印度开始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走，这是一个痛苦的过渡时期，我们当年派了很多人去香港、新加坡学习，受到很大的启发。2011年，中国同亚洲国家的贸易额达到1.2万亿美元，超过了中美贸易和中欧贸易的总和。我们在亚洲，又是全球经济发展最迅速、最有活力的地方，当然对中国非常有利。

吴心伯：今天，全球治理面临很多的问题，中国作为当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其他国家也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更多的期待。所以，这也为我们大国外交的推进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客观条件。换一个角度，您觉得我们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面临哪些不利的条件呢？

吴建民：讲挑战，最大的挑战是惯性思维。人类历史上几千年都是零和博弈，我得你失，我胜你败，零和思维具有很强大的惯性。现在世界变了，战争失去了昔日之威力，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丛林法则行不通，这是人类文明很大的进步。但要按照以前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冷战思维，还觉得战争能解决问题，就会把人们的思想引上歧路，看不到当今我们处在亚洲所面临的世界，看不到我们创造的良好条件。

吴心伯：中国的国力在不断增长，在推进大国外交的过程中，应该如何运用我们的力量？其他国家对此非常关注，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一种考验。

吴建民：中国人一定要清醒，“中国威胁论”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第一个原因，全世界72亿人真正懂中国的只在少数，他们会拿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作为参照来看中国。历史上大国崛起后都欺负别人，中国凭什么例外？第二个原因，他们会拿前苏联对照中国。他们说，习近平主席讲得很好，不

扩张、不侵略、不称霸，当年苏联强大起来为什么就扩张、侵略、争霸？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你也是共产党领导的，但是他们不知道（前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不一样。第三个原因，我们是差不多十四亿人的崛起，人类历史上没有过这么多人崛起的先例。中国块头大，一定会打破现存的利益格局，人家就不太开心。

我们对未来的阻力千万不能低估，这时候，一是要有实力。国力不强，就接近不了世界舞台的中心，现在我们接近了，这就是力量的增长。二是要讲道理。什么是软实力？就是要讲道理，讲得人家听得懂，讲得能打动人心。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真正能给世界带来好处，一个要靠言论，一个还要靠行动。

吴心伯：这就像我们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管美国反对，但因为这是个好事情，我们推进这个事情的方式也比较得体，所以最后多数国家，包括一些美国主要的盟国，都还是加入进来了。所以还是刚才您讲的那句话，大多数国家、大多数人，他是讲道理的，他是明白人。中国的外交怎么样能让人接受，就是把道理讲明白，把事情做漂亮，这样就能赢得人心。

前面您讲到关于世界秩序的问题，现在世界秩序也确实处在一个大的转折阶段，特别是中国快速崛起以后，大家都关心中国会对当今和未来的世界秩序带来什么样的变化。那么从您看来，您觉得在21世纪的世界秩序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如何界定？

吴建民：中国是世界秩序的改革者，同时也是推动者。应当说，目前的世界秩序中国人是得益的，要不然很难解释中国三十多年的大发展。但是，目前的世界秩序是西方大国的秩序，毫无疑问，这对西方国家更加有利。这里面有一部分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东西，但也有对西方国家比较偏向的东西，现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实际控制权都还在西方大国手中。怎么改变这个状况？逐渐改革。渐进，不是革命，我们是改革的参与者，也是促进者。改革是不容易的，改革要损害既得利益者，这时候就要通过讲道理，通过采取行动。亚投行就是一个推动改革的例子，我们这样做了，大家都来推动基础设施，把亚洲建设得更好，亚洲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也会有更大的动力。但是我们心还要更开阔一点，亚投行那么多国家参加，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美国、

日本也能够参加。

吴心伯：讲到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吴大使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典型的中国外交成功的案例。您觉得在21世纪，我们的年轻人要投身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中，他应该具有哪些基本素质？

吴建民：我觉得有这样一些素质是年轻人必须具备的。第一，要懂得世界，懂得世界现在的潮流是什么。你看世界看错了，不懂得当今国际关系的最大变化是时代主题变了，思想还停留在战争与革命时代，那你肯定不可能做好。第二，要懂得国家，懂得我们的基本方针。我们的外交方针就是坚持和平发展战略。第三，要会讲道理。知己知彼，知道讲什么话人家听得懂，知道讲什么话朋友越来越多，不要讲那种树敌的话，那是愚蠢的。

吴心伯：感谢吴大使接受我的访谈，今天您发表的观点非常精彩，我想很多听众和观众都会感到这对他们的思考是非常有益的，谢谢！

吴建民：谢谢！

铁路运输发展对于中俄合作意义重大

编辑整理：张昕蕊



Vladimir Yakunin

俄罗斯铁路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



采访人：**赵华胜**

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
研究中心主任



采访人：**沈逸**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砖
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在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之间发展商品陆路运输的想法是很明智的。陆路运输与海洋运输之间产生直接的竞争关系，这也许还是第一次。因此，在未来这样的（陆路）联系，乃至欧亚大陆辽阔领土的开发与各国全面可持续、相互信任的经济整体发展，无疑将备受青睐。」

赵华胜：弗拉基米尔·亚库宁先生，非常感谢您抽空接受我的提问。我共

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两周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国总统普京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我们知道，对于中俄合作、尤其是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合作而言，交通运输所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对于中俄交通运输合作的未来，您有何展望？

Yakunin: 首先，对于世界发展而言，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具体而言，中俄两国领导人、普京与习近平之间的理解与信任对于中俄两国关系便是如此。在我看来，此次在莫斯科签署的协议备忘录为中俄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关系的实质性发展铺设了新道路。展望未来，对于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的理念，我非常支持。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新丝绸之路理念的源头是泛欧亚发展经济带。我认为，在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之间发展商品陆路运输的想法是很明智的。陆路运输与海洋运输之间产生直接的竞争关系，这也许还是第一次。因此，在未来这样的（陆路）联系，乃至欧亚大陆辽阔领土的开发与各国全面可持续、相互信任的经济整体发展，无疑将备受青睐。

赵华胜: 谢谢您。下一个问题是关于中俄之间的铁路联系的。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俄之间仅有一个直接连接两国的铁路对接口岸，即中国的满洲里和俄罗斯的后贝加尔斯克，1903年开通，那时中国的这条铁路叫作中东铁路。其他两条线路都要通过第三国。经二连浩特到俄罗斯的铁路要经过蒙古，1956年开通。通过新疆的新欧亚大陆桥经过中亚，它的第一条线路在苏联解体前开通。

中俄两国边界线长达4300公里，沿边界线两侧又有广阔的腹地，您是否认为如今正是我们扩大中俄、尤其是边境区域铁路联系的良好时机呢？

Yakunin: 是的，您说的很对，中俄蒙古铁路曾经是一项伟大的成就，现在却显得不够用了。中俄双方正在考虑开展新的运输事业，另外双方也非常倾向于建设横跨额尔古纳河的铁路。但是，更深入地说，中俄之间增加跨境中转点是必要之举，但更为重要的是合作的实质内容，只有将更多的货物运输量吸引到铁路系统中来，才能够产生更广泛的经济效益。在俄国，跨西伯

利亚大铁路的建设对广袤的乌拉尔河腹地的开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中国而言，利用铁路的建设带动沿线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将是至关重要的。我相信在基础建设快速发展的地区，人民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赵华胜：谢谢。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感受到中俄两国人民近年来的互动越来越多，前往对方的国家旅行、彼此交流理解的愿望也越来越强。我认为火车旅行对于许多人而言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只是火车旅行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多年以前我三次乘火车从北京前往莫斯科，单程旅行就需要花费6-7天的时间。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修建北京至莫斯科的高铁是否为合理之举？

Yakunin：这不仅仅是合理的问题。您提到铁路交通用到了“旅行”这个词，是非常恰当的。乘坐飞机的时候，我们位于高空，什么景色也看不见，仅仅是被从一个地方运输到了另一个地方而已。而旅行，则是观察自然，观察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从事铁路工作的人，只要旅途中能欣赏到好风景，我当然更加青睐乘坐火车旅行。您知道，若能建设一条连接北京与伦敦的高速铁路，将会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正如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谈论的那样，也许我们能够开辟一条东起太平洋西岸、西至大西洋东岸的运输线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考虑采用一些先进的技术，比如磁悬浮铁路技术。未来，也许高铁的行驶速度能够达到和飞行比肩的程度。

沈逸：很高兴来到这里，我有些比较宽泛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俄在当今世界中的战略合作关系的。从上个世界八十年代到现在，您亲身经历了世界的变化。那么，您对于中俄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促进中俄双边关系发展有何理解？

Yakunin：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崛起即是引起这种的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这个角度而言，当我们谈论未来态势之时，欧亚大陆各国的合作、俄国和

中国两个伟大国度的合作也将更加深远地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发展。由这一点出发，我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一次前往莫斯科，与俄国领导人以及他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的举动，便清晰地彰显了两国之间的深厚信任以及进一步发展战略合作的意愿，因而我很确信中俄的战略合作将影响世界格局的未来发展。

沈逸：当我们谈及中俄关系的时候，我们难以忽视或避开美国在此双边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当然在当下，中美、俄美关系之中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矛盾。您对于这样的“三角关系”的未来发展有着怎样的理解和预测？

有人称中俄更加紧密的关系将发挥平衡美国霸权主义的作用。您对这样的观点持怎样的看法？

Yakunin：中俄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面时声明两国的友好关系并不对任何人构成敌对关系，而仅仅是为了促进两国自身的发展。因此，如果有人将中俄两国的紧密关系看作是对某个利益团体的挑战或威胁，那么这种思维方式在冷战后的当今世界而言显然是落伍的。

在我看来，我们需要承认美国是一个伟人辈出、成就卓著的国家，我们必然共存于世。但您也知道，当代社会中，当我们谈论稳定、和平、信任的时候，有一些野心的存在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我可以以我自己为例，我是个俄国人，我不想要任何人来教育我怎样生活，那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想要我的子孙世代代生活在纯净明朗的环境中，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也能和平地生活，他们可以和他们的中国朋友、韩国朋友、美国朋友交往。我不能接受的是对于我的国家、我的人民和我的子孙的压迫。

沈逸：您是本届上海论坛的重要贵宾，您能对本届上海论坛提出一些评价和建议吗？我想大家一定会很欢迎的。

Yakunin：对于上海论坛所提出的理念、提供的平台以及交流的实质内容，我们非常重视。本届上海论坛又一次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自由交流思想的平台。对于整个世界而言，上海论坛中所传播的观点、所考量的评价以及更

为重要的、上海论坛大家庭之中不同代表方的合作方式，皆会成为对这些观点进行进一步发展、共同构建互信、和平、可持续的发展环境的核心基础。

沈逸教授：非常感谢您。

中国需重建社会制度以走出生育率陷阱

记者：赵迪



蔡泳

现为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系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联合著有《中国低生育率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等书籍，发表论文数十篇。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专注于中国的生育率与人口发展、人口政策等具深远影响的社会学课题。

「生育率陷阱掉下去就不容易出来，走出“陷阱”需要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是政策的变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重建社会制度，让生育、养育、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比较好的吻合。」

记者：关于中国的生育率有1.8、1.6等等很多说法，在您看来，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是多少？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

蔡泳：对生育率认识的变化有个过程。中国的生育率1990年普查大约是2.1。1992年国家计生委调查出来1.6，当时大家都不相信这个数字，总觉得有很大的漏报。2000年普查是1.22，2010年普查是1.18。国家计生委在9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坚持说生育率是1.8。现在因为有比较好的教育数据、公安数据和普查数据进行印证，可以看到漏报确实存在，但没有那么高。从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数据来讲，现在中国的生育率很可能已经到了1.4，这个水平远低于更替水平2.1，即维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口稳定的水平。

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是在1.8、1.6左右，美国比较例外，差不多可以到1.9，而在经济危机之前能维持在2.1左右，经济危机后在往下走。北欧国家因为其社会福利各方面政策都比较好，其生育率一直没有掉到1.5以下。东欧和南欧很低，像意大利和西班牙是在1.3左右。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在东亚，中国台湾1.1，新加坡是1.0、1.1，中国香港是1.0左右，韩国1.2、1.3左右，日本是1.3、1.4左右。

记者：您认为中国目前生育率低的原因是什么？在这些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计划生育对低生育率有怎样的影响？

蔡泳：很多人认为计划生育对现在的低生育率有很大影响，但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就算中国不搞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下来。最好的例子是台湾，台湾没有独生子女政策，但是它的生育率曾经掉到过0.9。在60年代，全球面临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台湾开始推广“Family Plan”（英译中也有译为计划生育的，为了区别，应该是家庭计划）、避孕、提高妇女地位等措施，其生育率很快降下来。所以我开玩笑说，两岸已经在生孩子上已经统一：都只生一个孩子。除了计划生育，技术进步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现在避孕和人工流产在技术上都不是难题。

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当妇女的教育程度提高、劳动参与提高之后，她们对自己生活的理想和要求不在于再生孩子。原来很多妇女18岁就结婚生孩子，现在妇女完成研究生学业再工作几年之后就差不多30多岁了，生孩子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生育率的降低是一系列的社会发展变化，不是哪一件事情决定的。

东亚地区低生育率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文化对教育和子女培养的重视。第一，正是因为对教育的重视，大家会在教育的质量和数量之间做选择。一定数额的教育经费，如果有三个小孩，可能只能保证每个人读到高中毕业，如果只剩一个小孩，就可以送他到美国去留学。第二，教育是有外部性的，当独生子女家庭，或者说重视质量的家庭，把教育资源的价格搞上去之后，会影响其他人的生育决定。同时，社会上出现了教育上的攀比现象。综上，生育率不会高。

记者：2014年8月，您在微博上说中国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请问这有什么依据？在您看来，中国何时能走出这个“陷阱”？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蔡泳：所谓的“陷阱”，就是生育率掉到一定程度后（如1.5）就很难再回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育成本太高。而生育成本是社会性的、外部的，生育成本一旦提高，就像房价一样很难再下来。

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有两个依据。第一是数字上的，即统计出来的生育率。第二是我们大量的观察研究。例如，我们曾经在江苏省跟踪调查了3000名具备生育二胎资格的妇女，7年研究统计，最终生二胎的只有百分之十几。

我觉得很难能走出这个“陷阱”，至少在未来的十年之内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日本的低生育率已经将近40年了，一直没有大的起色，台湾一直也没有变化，新加坡也一直在鼓励生孩子，但是没有变化。陷阱掉下去就不容易出来，走出“陷阱”需要社会的环境的变化不是政策的变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重建社会制度，让生育、养育、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有比较好的吻合。

记者：您如何评价“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下一步的人口政策应该如何发展？

蔡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实施“单独二孩”的决定，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计划生育委员会因为怕引发生育潮而一直在拖延，计生委预计每年会多生200万人，但是去年申请生二孩的仅有100万，我估计申请的人里面有最多50%能生出来，就是说今年的出生数或增加50万，对比中国现在1500万左右/每年的出生人数，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没有任何理由来担心全面放开单独二孩之后的后果，我认为应该全面放开，政府如果为了保险起见，在时间上可以先放开40岁以上的，次年再放35岁以上的。

记者：生育率长期低下被认为是二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消费乏力、社会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那您认为，低生育率会给中国带来怎样

的影响？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吗？

蔡泳：不能以人口决定论的视角看问题，尽管我们讲日本“失去的20年”，其经济水平可能没有增长甚至负增长，但是日本总的来讲生活水平没有下降。经济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人，人口要是不增长了，其他要增长的更快才能来补偿，其他如果增长得不够快，经济就会萎缩，所谓GDP就是人均乘以人数。从长期来讲，生育率低下肯定对经济有很大影响。从短期来讲，生育率低下也给中国带来很多的机会，比如中国的教育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高等教育的扩张是爆炸性的，这其实是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机会。

中国跟日本的发展道路很像，在有人口红利的时候，经济增长很快，现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也很像。中国确实很有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但是从人口红利来讲，至少中国还有这么多人。但是可持续的发展拼的不是人的数量，而是人的质量。放开人口限制，放开口口限制，给人以创新的空间，让有才能的人能进来，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治理：方法和可能性

记者：陈宇婷



Ben Cashore

耶鲁大学的环境治理和政治科学教授，耶鲁大学治理、环境和市场计划（GEM）以及森林政策和治理项目的主任。

「当政府和市场之间进行良性互动时，国内外的环境治理才能最成功。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的未来是一片光明的。」

记者：你的工作主要是关于国内的非政府、以市场为导向的治理，您认为这种机制会在说明国际环境治理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Ben Cashore：我会从两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对“非政府、市场导向（Non-State-Market-Driven）是什么”和“它为什么会存在”非常好奇。我们看到它无处不在，覆盖了林业、矿业、渔业以及全球的碳市场。它为什么会存在呢？是为了利基还是利润？这有助于回答第二个有关它是不是真的有效的问题。如果你把“非政府、市场导向”运用到林业部门，那么它可以处理掉所有林产品。但是如果你将它运用到渔业部门，则情况相反。所以这取决于它尝试的项目以及它的作用在哪儿。

所以我们认为，在气候领域，我们有两种不同的“非政府、市场导向”搭配。如果你着眼于所有不同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气候因素，那么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学习”。政府、企业 and 非政府组织都试图建立适当的机制。只有当政府决定采用那些知识时，其意义才会体现出来。

学习是“非政府、市场导向”治理的重要成果。哪怕这意味着最终由政府接管。又比如，有很多“非政府、市场导向”努力投入到了绿色建筑规范方面。例如，在耶鲁大学，我们的绿色建筑标准是由私人部门制定的，而不是政府。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能会采取这样的标准，所以直接影响很小，但我们发现，美国的政府正在采纳这些“非政府、市场导向”建筑规范。所以，这会直接影响政府对这些规范的看法，而这些政府也意识到，只要这些规范切实有效，他们就会予以采纳，那么这些规范就会成为政府政策的一部分。

现在，如果进行气候谈判，那么“非政府、市场导向”另一种可能性是，尽管国际社会可能会签订国际协议，但是理想的解决方案与现实之间仍会存在差距，因此，“非政府、市场导向”可以弥合这个差距。就拿CDM（清洁发展机制）为例，在这个机制下，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为了在发展中国家承接项目并获得碳信用额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评论家表示，这样的机制在社区的环境价值在哪里？所以，CDM不再重新发展艰难的协议，而是提供了包括社区和环境价值在内的黄金标准。在很多项目中，你不仅需要CDM，还需要CDM全球标准认证。这是一种较高的方法，其中私人机构强化了政府，而政府则强化了私营部门。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行动，形成一种互动。

记者：很多国家希望申请进入该国际认证体系，您对此有何建议？

Ben Cashore：我认为这取决于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对于林业来说，有很多全球性行业存在于供应链之中，在其中我可以看到很大的潜在利益。现在，如果有一个国家为高标准的林业实践制定了政府法规，那么当这个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时就会一败涂地，因为它对国内的公司过于严格了。这意味着它伤害了自己的公司。但是，如果整个供应链采用了类似的标准，那么各个国家再也不必担心了，因为他们做到了市场和保护兼顾。有时候，这很难通过国际协议来实现，但只要有供应链，“非政府、市场导向”治理可以促进那种公平。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例如，FSC（森林管理委员会）承认，必须在内部制定一套具体规则，因此它在原则上是一个全球性的标准，但对各个国家的内部利益相关者而言实际是一种明确的统治。因此，国家可能无法摆脱担心不公平的问题，但是以供应链为焦点可以减少这些顾虑。所以，我

也看到了一些潜力。

政府不会介意当消费者付出更多时各个公司是否得到回报，而面临的挑战是，没有为公司带来需求。“非政府、市场导向”也有可能不适合某些其他部门的工作，因为有些时候，它无法凝聚利益。但是在林业，我看到“非政府、市场导向”在如何规范林业公司或如何创建规则以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等方面似乎效果不错。不过，在土地使用分配方面，我觉得“非政府、市场导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工具，因为它很难获得足够的市场激励来获得保障。因此，在土地使用分配方面，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国家参与。

记者：您能不能更加详细地说一下这种利基情况？以及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制定环境政策？

Ben Cashore：有许多利基（细分）市场的实证例子。有时候，最初进入利基市场的公司，他们的境况会好一些，因为有更多的消费者购买他们的产品。但有时却相反，因为他们要面对竞争，并失去了低价值和主导地位。这取决于价格，还取决于其背后的政策层面。所以一个利基市场可以根据扩大的逻辑来创建，在其中，它强化了原有的市场，或者它也可以创建来破坏原来的客户群。政策制定者必须确保何时强化原有市场。例如，在相同的标签中，一些企业不希望成为主流，因为市场上可以让一定数量的消费者付出更多的空间极其有限。如果它变得太广，价格将下降，那么，他们就失去了自己的市场份额。

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它在设计政策时却很实用。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到很多不同的路径。在环境中，你可以有多种有效的路径，但你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将原则铭记在心。我们需要思考如何避免一个无法扩大的利基市场。

记者：对于全球木材合法性认定，中国一开始并没有接受。为什么您认为中国之后会改变态度，在中国的应用背后究竟是什么市场因素在驱使呢？

Ben Cashore：有关合法性认定，有趣的是，虽然这是一个跨国机制，它

旨在帮助各国政府加强自己的法律，因为它是关于非法活动的。原则上，它没有试图在法规层面挑战主权，而是在机制层面。十年后，所有这些最初反对的国家给予某种形式的支持，包括中国。这些国家最后之所以给予了一定的支持，那是因为它更大地保证了不会真正对主权形成实质性的影响。这里面有一些国内的考量，因为中国还有自己的精确标准。

这样的变化是指来自欧盟和美国的贸易法律的压力，因为他们需要某种保证体系。直到美国通过了该法案，并要求把林产品引入美国的进口商们必须提供某种证明，然后中国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在美国，因为无法证明产品是合法的将会面临严重的问题。但在国内，非法采伐文件属于国家林业局管辖，而商业文件由属于商务部，所以我们认为，林业局可以在国内夺回一些失去的权力。所以，内部交流也可能有助于解释。

但同样，虽然市场的信号很强劲，很清晰，但是它们也很抽象，所以在我们确实实地看到它的效果之前，要想未卜先知的确不容易。

记者：全球社会越来越关注巴西的热带雨林，那么您对巴西热带雨林的保护有何看法？您是如何评价它背后的“非政府、市场导向”治理的效果的？

Ben Cashore: 现在，供应链最新关心的工作被称为“不滥砍滥伐承诺”。私营部门开始承诺不购买导致森林砍伐的产品。这是针对巴西的大豆产业，很多公司在2008年停止了森林砍伐，当时的这一事件被认为是这种“不滥砍滥伐承诺”的一部分。许多非政府组织认为这个承诺开始见效了。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其效果微乎其微。其原因是，“不滥砍滥伐承诺”只会发生在砍伐森林之后。所以，在这些公司砍伐森林的计划得以实施之后，你才终于让他们同意这个东西。议会不断推延这种滥砍滥伐的日期，1993年以后，他们不会为了大豆产业而起诉这些公司，直到2008年。因此，我认为它不仅没有制止，反而加强了供应链中的森林砍伐。我认为他们需要制定更清晰的土地使用分配来强迫政府成为它的一部分。“非政府、市场导向”完全可以通过认证但也是该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的外部公司来助一臂之力，但这里的市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弱的工具。

我认为Galati 认定（Galati Verification）可以在土地利用分配和加强政府

的政策中发挥作用。但是，这与“非政府、市场导向”或“不滥砍滥伐承诺”不同。那些都太弱，但如果你用它们来加强政府的政策，也是行之有效的。我认为环境治理已经赋予了“非政府、市场导向”太多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让它有的放矢，这样才可以把效果发挥到极致。

记者：你如何评价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的努力，以及你认为中国会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什么作用？

Ben Cashore：国际规范影响了中国国内的做法。这种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的规范恰恰来自欧洲和美国，所以中国现在参考这些实例。当这些国家试图审议全球政策的影响时，中国也可以帮助它们。很明显，中国在国际讨论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强，因为它不仅关心自身的利益了。

关于环境政策，一方面是这个政策会持续多久，另一方面是它能够改变的简单程度。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要想改变一个政策也很难，但如果它确实要改变，就可以改回来。这种改变机制就是，如果政府想，它很有可能就可以。在美国，权力太散，因此很难改变政策。中国可以迅速地做更多的事情。现在，你可以看到中国是如何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的。这算是某种形式的结合。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决定成为政府的全球领导者，而中国也可以，甚至比美国更快。

“自贸区”应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摸索制定高水平的游戏规则

记者：史晋星



陈波

现为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秘书长，世界经济与贸易系副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对中国经济宏观经济改革以及中国（上海）自贸区研究的评论和观点多次出现在诸如《半月谈》、《人民日报》、《21 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Economist》、《The Wall Street Journal》等国内外主流媒体上。

「“自贸区”不仅仅是为我国摸索适应高水平投资和贸易体系的规则，而且是为“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国家摸索制定高水平的游戏规则，诸如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国家法治化、政府竞争中立、资本项下的开放等等。」

记者：有学者认为中国领头的雁阵模式是“一带一路”的真实内涵，您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备这样的条件吗？

陈波：雁阵模式是由日本学者小岛清教授提出来描述战后日本与东亚地区国家间的国际分工模式，主要是由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带动后进的国家不断向前发展，其中日本被看作是雁首，亚洲“四小龙”是雁翼，日本通过资金

技术的供应、市场吸收和传统产业的转移，带动四小龙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又将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雁尾的东盟。

一带一路更类似于全球产业链上的分工合作，我国目前仍然是以制造业为主，就像最近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所说的那样，“十八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这样来看的话我们仍然需要大量中亚和西亚的能源和原材料；另外一方面我国又处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那么必然需要将一些淘汰或者濒临淘汰的落后产能向低劳动成本的国家转移，包括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东南亚国家，像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等。同时印度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经过调整以后达到7.4%已经超过中国，至于中国会不会从此以后会一直低于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我觉得也不是太大的问题，毕竟人均GDP而言，中国是印度的将近5倍，所以未来印度也是承接我国产业转移的重要支撑。

目前我国的重点是营造一个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国际环境，一方面是在价值链上向高附加值一端发展，另一方面在下游寻找其他国家承接我们的过剩产能。雁阵模式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也就是说先进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技术通过贸易渠道一层一层扩散到周边国家，就像是以点带面。目前在做的一带一路更加类似于产业链上的合作，形象一点来说就是以点串线。

记者：基础设施投资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升对中国工业产品的需求，助力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请问在这方面我们如何以市场为导向，避免政府决策导致无谓损失？

陈波：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法制、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都比我们更落后，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市场失灵比比皆是，所以需要政府干预。现在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就是跨国层面的政府干预，以帮助、鼓励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诸如廉价的资源、劳动力和海港等优势，确保国际政治环境的稳定，避免由于政治动荡、东道国政府腐败等缘由投资化为泡影。一带一路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就是希望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以政府的信用担保东道国良好的商业环境。

至于实际项目的投资选址运营当然主要还是应该以市场为主体，不过走出去的企业也要注意同时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帮助地方经济发展、繁荣稳定，提高企业自律性要求，避免通过高污染、假冒伪劣产品的销售谋取短期利润而给其他中国企业带来负的外部性，这方面也需要我国政府加以规范和约束，完善法制建设。

记者：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时遇到所在国政治稳定风险，我们有怎样更好的应对策略？

陈波：首先，政府的职能部门应该更加专业化、高效化，增强在东道国的存在感。比如外交部2012年新成立的国际经济司，从政治和外交角度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经济治理，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和经济安全。再比如通过商会、智库加强人脉的培养和智力支持，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态的研究，评估在东道国投资的潜在风险状况；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增强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与当地的政界、商界和宗教界的领袖培养良好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其次，通过更多国家的合作来惩罚违背承诺甚至言而无信的政府。比如说通过目前成立的亚投行在所有成员国之间形成一个集体行动原则，如果有成员国进行擅自封闭港口、截断交通要道等违背原则的行为，则会受到其他亚投行所有的成员国的一致惩罚，同时该成员国的信用也会有相应评级上的下调。这样通过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凝聚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可以有效发挥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和约束上的杠杆效应。

记者：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请问在亚投行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如何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陈波：第一，在法定资本金缴存方面人民币可以充当抵充货币。具体而言，亚投行总共1000亿美元的法定资本金，比如按照《亚投行章程》规定，中国的出资比例达到30%，也就是说300亿美元，如果其中150亿美元由人民币作抵充货币，那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第二，人民币加入SDR篮子货币，会使得180多个国家储备货币中提升人

人民币的储备份额，同时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在计价和结算方面的国际化水平。

第三，通过亚投行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发挥杠杆效应，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比如通过PPP方式帮助国内的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海外基建项目，从而在相应的投融资交易环节当中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准。

目前按照《亚投行章程》规定，亚洲域内的37个国家占整体出资额的75%，其余25%分配给欧洲等区域外20国。同时域内国家基本是按照国内生产总值（GDP）在本地区的比重来进行分配。域外创始成员国也是以GDP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来认缴资本金。从这一安排来看，最大出资国是占到30%左右的中国，第2位是出资10%左右的印度。另一方面，欧洲加上澳大利亚和韩国等的发达国家的合计出资比率有望与中国不相上下。虽然目前中国所占股份份额较高，不过放弃在亚投行的一票否决权几乎已成定局。

记者：除了以上国际组织提供资金融通，市场关注的另一个热点是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撬动社会资本，助力“一带一路”建设。问题是目前走出去的能源、通信、高铁、核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大多跟国企直接相关，民营企业在这方面有哪些可为之处？

陈波：从目前走出去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来看，不论是核电、高铁、大型装备还是能源这些领域大都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在基础设施逐渐完善的同时会拉动国内大量基建需求，民营企业可以在钢铁、水泥、玻璃等建筑材料方面过剩的优势产能走出去，与沿线国家进行产能合作。

而且长远看来，先行走出去的国有企业也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摸索制定保障国内企业利益的稳定规则制度，随着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深入，民营企业可以在此基础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在日前接受劳动报采访时，您谈到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全面对接，最大的意义在于与沿线国家之间，也建立这样新的、对等开放的投资贸易游戏规则，请问面对市场不完善、政局不稳、产业基础薄弱、制度不健全的沿线国家，如何达成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

陈波：自贸区是我国摸索、承接或者适应高水平投资和贸易体系的试验田，希望能够尽快摸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体制，然后在全国推广。

目前的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如何与“自贸区”对接？之前能源安全、投资安全、资本在东道国的流动性保障等等都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协定对中国的压力。现在中国之于“一带一路”沿线上的中亚西亚国家，就像是美国之于我国一样。这样来看的话，“自贸区”不仅仅是为我国摸索适应高水平投资和贸易体系的规则，而且是为“一带一路”沿线上国家摸索制定高水平的游戏规则，诸如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国家法治化、政府竞争中立、资本项下的开放等等。

所以“自贸区”在“一带一路”上的作用可以总结为：承接先进、启发后进，方向一致，程度不一。

创新是关键：亚洲和中国的未来十年

记者：谢欣辰



Maggie Xiaoyang CHEN

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和区域贸易协议。

「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其一是通过创新提高私人公司的生产效率，如此所有公司的生产效率都将会提高。其二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如此生产率高的公司会享有更多资源，而低效率公司则会被淘汰。」

记者：您出席了上海论坛主题为“亚洲经济如何重返繁荣”的子论坛。那么您采用哪些标准来评价和预测亚洲经济的发展呢？基于这些标准，您对亚洲经济的前景预期如何？

Maggie Chen：一般情况下，我采用的标准与其他人基本无异，比如，GDP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率、通货膨胀、外债/GDP、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资本流入/外流。根据上述标准，我认为未来十年，亚洲仍然是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亚洲仍然是一个稳定发展的地区，尽管发展速度不如近十年快。而一般而言，驱动增长的主要因素仍然是贸易、FDI和投资，但同时希望国内需求、服务、创新和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有所提高。所以从整体来看，我仍然看好亚洲经济。当然，问题也存在，比如中国的增长减速对区域乃至对全球均有影响。

记者：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在您看来，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是否有利于亚洲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为什么？

Maggie Chen：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确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全球各地都是这样，并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我认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整体上有利于亚洲经济的发展和稳定。这不仅为亚洲的公司带来了更多进出口机遇，还带来了亚洲内外跨国公司提供的更多FDI。此外，亚洲的经济一体化还将为亚洲国家间带来更多其他领域的合作机会。特别是当美国正在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时，亚洲，尤其是中国，必须建立对应伙伴关系和一体化集团，这一点很重要。

然而，这明显存在问题。首先，比如TPP目前并不包括中国，而亚洲的区域贸易协定也极有可能不会囊括美国。但有些国家必会同时签下两种贸易协议，这意味着中国和美国可能在上述协议网络中扮演着类似于“发言国”的角色。如果我是一家公司，我可能会愿意在越南、马来西亚等枢纽国开展业务，而非发言国，因为枢纽国与中国和美国都签订了协议。这样，枢纽国在某些方面，如吸引FDI，会更有竞争力。这就是我们必须探讨的一个问题。其次，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通过多元市场来确保稳定发展，但也能引发经济危机。如果某个成员国发生了负面冲击，就会蔓延到其他成员国，因为成员国之间存在深层贸易和金融关联性。

记者：那么您认为亚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发展到何种程度？亚洲能否建立像欧盟一样的一体化集团？

Maggie Chen：我认为，亚洲无法达到像欧盟那样的一体化程度，至少在短期内无法实现。欧盟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经济集团。欧盟已经远不止是一个贸易甚至经济一体化集团。亚洲则不然。在亚洲，各国总体上处于欠发达，同时各国处在差异较大的不同发展阶段。考虑到这一点，再加文化和历史原因，各国的经济目标也各不相同。因此，我认为我们无法达到欧盟那样的一体化程度。但是，要着手提高一体化程度，贸易自由化肯定是当下最重要的一步。但即使这样，也需要付出大量工作和努力，因为当事情牵

涉如此之多的发展中国家时，由于每个国家都想保护农业、服务业等本国国内行业，谈判就会十分艰难。

但总体而言，我认为，即便我们无法达到欧盟那样的一体化程度，这也绝对是一着漂亮的棋。可能这就够了，因为如果达到了像欧盟那样的一体化程度，就可能会面临许多已经出现的严峻问题，比如我之前提到的危机蔓延。

记者：您认为亚洲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困难？

Maggie Chen：我认为，问题之一，正如我之前说的那样，就是所涉及的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并且这些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当你努力使所有这些国家一体化时，必须平衡这些迥然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利益，这是十分困难的。很难同时协调这么多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并提出所有国家都一致同意的政策。例如，农业往往是一体化推行过程中比较艰难的一个领域，另外一个则是服务业。各国不愿意在这些行业过多地依赖外国供应商。因此，这些可能会成为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些挑战。

此外，我们签订了如此之多的协议，一份接一份。比如在亚洲，东盟（ASEAN）已与中国、印度等国签订了协议，而除了ASEAN，中国还与新加坡、韩国签订了协议。这些协议已经成为我们平常所说的“意大利面碗”（spaghetti bowl）。所有这些协议都设定了不同的规则，如原产地规则 and 不同深度规则。公司乃至国家很难理解并实施这些制度。如果我是一家有意进行投资的中国公司，我会在投资地点、金额和内容方面难以抉择，因为哪个国家的市场准入政策最优、成本最低不好说。众所周知，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分散化。许多公司将生产进行分割、不同的生产阶段安排在不同国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当你签订了诸多相互干扰的协议，公司就很难制定出最佳的生产和区位策略。这些就是我们将会面临的一些挑战。

记者：如今，我们用“新常态”来定义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中国主席习近平也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那么您对中国的新常态，比如中国的GDP增长减速，有何看法？造成这一情况的国内外原因有哪些？

Maggie Chen: 中国的发展速度显著减缓。我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很明显。过去十年中，中国的发展由投资、贸易以及建筑业、制造业等行业拉动。对这些增长引擎的依赖会导致许多风险，而经济也易受其影响。例如，当美国、西欧国家等工业国家进入经济衰退时期，海外需求疲软就显著降低了中国的出口和经济总增长。而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无法持续很长时间，因此也就无法成为可持续的增长源泉。此外，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实现了史上最伟大的一项结构转变，有上百万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经济体。但如今，中国正处于这样的境地，即没有更多可从农业转移至制造业的劳动力且劳动力成本迅速攀升。因此，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也意味着中国必须找到其他的增长引擎。

众所周知，我国正努力从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变为内需驱动型增长。同时，我国也处于下一个结构转变时期，即从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转变为多元化经济体。我认为，提高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一个更具创新力的经济体也很重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不及GDP增速。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其一是通过创新提高私人公司的生产效率，如此所有公司的生产效率都将会提高。其二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如此生产效率高的公司会享有更多资源，而低效率公司则被淘汰。这样，国家的综合生产率就会提高，这一点对中国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记者: 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了房地产市场泡沫引起的金融危机。同样是东亚国家，您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与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形势是否存在任何相似点？为避免中国经济陷入所谓的“硬着陆”窘况，您认为中国应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本国重蹈日本的覆辙？

Maggie Chen: 是的，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房地长市场和资产市场泡沫以及两国均属于出口拉动增长型经济体的事实。但也存在差异。第一，中国的发展阶段与日本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截然不同。当时的日本已经是一个人均GDP很高的发达国家，而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仍然相对较低。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和如今的中国之间的一大差别。这也意味着，中国可以避免

陷入日本的窘境。在经济转型和增长方面，中国仍有很大的空间。举例来说，中国的服务业仍有更多自由化和增长空间。因此，中国比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更具增长潜力。在经济政策方面，我国需避免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上犯日本所犯的错误，同时也需推行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记者：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就是产业结构调整，这也是早前其他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与那些国家的经验相比，您认为中国此次结构调整的特定特征是什么？其他发达国家有哪些经验可供中国参考？

Maggie Chen：在行业结构调整方面取得成功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等。我们可以从这些国家中借鉴很多经验。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的第一次转型使其从农业经济体转变为制造经济体。这一过程促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现在，我国正开始进行第二次转型，目标是转变为一个多元化经济体。我们不应该放弃制造业，但应该寻求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兼顾制造业和服务业。所以，这就是我国此时面临的情况。

我认为，我们可以着眼于韩国，借鉴其经验。例如，我们可以借鉴其研发政策。韩国通过提供信贷和补贴，鼓励公司创新。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但仍可以改善效率和创新政策的回报，以便更好地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本。我们应该成立自己的高科技优质公司，同时逐步提升价值链，从以低端制造为主的经济体发展为拥有高端、优质和高技术含量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经济体。创新和人力资本是关键。鉴于新公司的生存率很低，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更好地识别有发展前景和潜力的公司，包括新创公司和现有公司，并实行创新、扩张、质量和生产率提高激励机制。政府还应再接再厉，促进产学合作。

记者：您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在全球新常态的环境下，您认为中国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应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Maggie Chen：中国的出口企业过去常常打价格战。如今，这些企业应该努力改善其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及其在外国市场上的信誉。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的做法。在积累了更多出口方面的经验后，这些出口企业就可以

学会从市场和产品入手扩大规模。多元化是增长和降低风险的一个有效途径。这些出口型公司中的部分公司也可发展为跨国公司。有证据表明，出口是FDI的垫脚石。例如，我可以从成立一家出口企业着手，在掌握有关国外市场的更多信息后，可以直接在该国投资，以降低贸易或生产成本、扩大市场准入。中国的出口企业可将这些办法作为下一步措施。

加入北极理事会后，中国如何有效参与北极事务

记者：邵一帆



程保志

武汉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兼任中国欧洲学会欧洲法律研究会理事、法国研究会理事，欧盟北极论坛咨询委员会成员。主要从事北极治理与相关国际法问题研究。

「气候变化、北极环境保护是我国参与北极事务一个有力的切入点。参与北极事务，我们并不讳谈利益，但是如何更有效地为北极治理做出贡献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记者：亚洲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北极并参与北极事务的？

程保志：亚洲国家，主要是中日韩三国，参与北极事务最早始于科研和科考。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就对北极航运做过前沿研究。可以说，日韩两国航运界对于北极航道的开通非常关注，相关研究也非常深入。而中国最早参与北极事务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科考。因此，至少从北极科考这一角度来讲，中国并不是后来者。相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北极科考的某些领域，中国还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我国从社会科学角度关注北极最早始于2007年俄罗斯在北冰洋海底的插旗事件。该事件后，国内社科学术界对于北极的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国际法层面和国际关系层面。国际法层面的研究主要聚焦北冰洋的法律地位；国际关系层面的研究涉及北极国家对亚洲国家参与北极事务的态度以及双、多边关系的发展等。

记者：北极事务涉及领土争端、资源开发、航道使用、环境保护等等，那么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能从哪些方面入手？

程保志：包括中国在内的五个亚洲国家成为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国已经两年多了，下一步该如何积极有效、富有实质性的参与到北极理事会以及北极治理的进程中应该是我们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我认为主要还是从气候变化、航运、北极资源角度着手。特别是从环境这一角度来讲，北极不仅仅只是北极国家的事。研究表明：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冰融化对东北亚国家的整个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有些影响甚至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举个例子，北极海冰融化引起的全球海平面上升会对我国沿海城市，比如说上海，产生直接影响。可见，尽管我国看似离北极圈很远，好像与北极事务无关，但实际上北极与我们休戚相关。因此，气候变化、北极环境保护是我国参与北极事务一个有力的切入点。参与北极事务，我们并不讳谈利益，但是如何更有效地为北极治理做出贡献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记者：北极理事会对于中国等亚洲国家参与北极事务有没有顾虑？如果有，我们应该如何消除他们的顾虑？结合这一点，下一步中国在北极问题上的研究重点又在哪里？

程保志：我国在提出海洋强国战略时，极地区域也是被包括在内的。北极和南极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我国现阶段对极地事务的投入巨大，经费、人员、后勤各方面都得到了充足的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也对国际法、国际关系学界的相关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新加坡和韩国为例，它们都在国家层面出台了关于北极政策的阐释性文件，通俗来讲就是对外讲明自己国家要在北极干什么，而中国在官方层面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文件。作为学者，下一步则应该考虑如何建言献策，将自己的智慧与国家的需要和战略结合，将我国的政策目标阐释得更加清晰、更好让人理解，为我国参与北极事务铺平道路。不管怎么说，尽管北极国家对亚洲国家的参与持积极态度，但毕竟是在它们家门口，这总会让它们在心理上觉得不是很适应。特别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参与尤为关注，也难免有所顾虑。

需要注意的是，北极八国除俄罗斯外，这些国家的法制十分健全，在人权标准、劳工标准、环境标准上也相当严格。同时，由于一些北欧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当地的省、州政府也制定有很多当地的法律和政策，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不仅限于国际机制或局限在国家层面；这些地区性的标准和法律恐怕也是我们下一步的重点研究对象。

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不仅要将自己的北极政策阐释清楚，也要把其他国家、地区的相关政策、法规吃透。

记者：与南极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南极条约》不同，围绕北极的争端主要通过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解决。您如何看待这一国际法律体系？

程保志：为了使我国更有效参与北极事务，我们国内一些学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近北极国家”（Near-Arctic State）。即由于中国处于中纬度地区，他们认为中国不应该被定义成“非北极国家”（Non-Arctic State）。他们的目的其实是想表明中国并非一般的非北极国家。但是西方国家不这么认为，他们并不大认同你提出的所谓“近北极国家”这一概念，就认定你是“非北极国家”。这一现象也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即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往往更具有话语权。这主要是因为现行国际法以及国际法的体系、理念都是源自西方的。我们能做的是如何利用好现有的国际法规则。但说到底，这些规则始终是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所以这一方面的研究对国内学者而言确实也是比较难的。此外，中国国际法学的整体研究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我国在国际事务影响力和话语权上的迅速提升这一大的背景。

记者：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国之间有没有建立相互的沟通机制？而中国作为观察员国，有没有与北极国家建立相应的交流机制呢？

程保志：尽管中国成为了正式观察员国，但是北极理事会对观察员国有严格的限定，比如说开会的时候只能坐在指定的地方，没有表决权等等。讲的不好听一点，就是只有在需要做贡献或者尽义务的时候才会想到观察员国。

北极理事会的一些观察员国，比如波兰，也试图通过举办观察员国间的

会议进行沟通交流。但观察员国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渠道目前还是比较少的。

谈到北欧国家，比如说作为北极理事会成员国的芬兰、挪威和冰岛等国，应该说我国与他们之间的沟通渠道还是很畅通的，比如中国北欧北极合作中心秘书处就设在上海。我们近几年也前往赫尔辛基、雷克雅未克等地参加了一些国际性的会议比如北极航运论坛（Arctic Shipping Forum）、北极前沿会议（Arctic Frontiers）、北极圈大会（Arctic Circle）等。应该说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北欧国家，对于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事务还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这与美国、俄罗斯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是，这些北欧成员国更多地还是强调你观察员国要做贡献，而不会跟你谈所谓权利的问题。除北欧国家外，我国学者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北极政策学界也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性政策沟通平台。

记者：随着北极海冰的融化，舆论对北极航道的关注也在持续上升。如何看待其现阶段对于我国的战略价值？

程保志：实际上北极航道开通还面临着冰情不确定、航运基础设施匮乏、对船舶自身的要求较高（最好具有一定的破冰能力）、船员前期培训投入、搜救能力欠缺、海上保险等方面的问题。即便夏季完全无冰，全年通航时间最多也只能达到100多天，因此目前还无法完全取代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等传统航道，最多只能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现阶段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中并没有把北极航道纳入进去，但就国家中长期发展而言，北极航道的潜在价值将对该战略的推进构成重要的战略支撑。

期待更深层次的自由贸易合作

记者：邢妍菁



CHUNG Chul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亚太部部长。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带来的不仅是贸易量的增长，更多的是促进两国之间的投资和交流。自由贸易的签订最大的作用是将使中国企业面临更多的合作与竞争，这些市场化的竞争将激励中国企业，促使它们从内部改变自己，从而变得更有效率。对于政府方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双方之间的信任和声誉，这对于中国政府和韩国政府双方都是一样重要的。如果建立起了较高的声誉，那么也将有利于后续更深入的合作，以及和新的贸易伙伴签订协议。」

记者：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订对两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中国的农产品行业和纺织行业，韩国的电子行业和化工行业，除了直接观察到的销量增长外，还会带来哪些影响？

CHUNG Chul：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带来的当然不仅是贸易量的增长，更多的是促进两国之间的投资和交流。比如更多的韩国企业到中国投资，中

国企业到韩国投资，实现产业链上的分工，生产将变得更加效率。另外，自由贸易协定将会使进入对方的消费市场将变得更为容易，中国的消费市场也是十分可观的，对韩国企业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记者：30多年的发展使中国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中国在世界产业链的分工中位于“微笑曲线”的底端，现在中国正在积极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中韩两国的合作对促进这一转型将有什么帮助？

CHUNG Chul：自由贸易的签订最大的作用是将使中国企业面临更多的合作与竞争，这些市场化的竞争将激励中国企业，促使它们从内部改变自己，从而变得更有效率。同时也需要认识到，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一些低端产业已经被东南亚等国家侵占，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企业将不得不离开微笑曲线的底端，加快企业自身转型。在合作的过程中，其他企业不会直接告诉你它们的核心技术，但是通过竞争可以促使企业从自身开始改变，慢慢形成自己的高端技术、核心技术，比如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记者：通过竞争与合作，中国和韩国互相能为对方提供什么利益？

CHUNG Chul：中国和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展很缓慢，经过十多年的调查、共同研究和协商，才在现在的内容上达成合意。即使是现在贸易的自由化层次还是很低，所以我在基于各种原因都愿意不把这次协定称为开放程度很高的协定。目前商品贸易中，约90%的关税商品实现了自由化，但是以贸易量衡量，只有约85%实现了自由化，服务贸易的开放进展很小。具体来说，根据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在未来二十多年内，关税条目中只有91%的中国产品和92%的韩国产品享受关税免除。和韩国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相比，这并不是十分高的数字。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和韩欧自由贸易协定将在协议生效后的十年内，为双方关税条目中至少97%的产品消除关税。

在商品贸易方面，韩国想要保护自己的农业，中国也想要保护自己的机械制造业，因此遇到了一些阻力。可以想象，即使这些行业完全开放后，也会遇到一些当地的保护措施，继续开放这些行业将变得很困难。

当然，如果中国和韩国之间现有的自由贸易政策执行的效果很好，将能

为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以后和其他国家谈判时，提供一些基本的标准。

记者：韩国优势的服务贸易产业比如医疗健康和美容整形将如何影响中国的相关产业？“韩流”影响巨大，中国和韩国将如何在文化产业上合作？

CHUNG Chul：医疗健康和美容整形的确是韩国非常先进的产业，中国和韩国在服务贸易上合作还不多，但是这一进程将变得很快。中韩已经同意在FTA生效后的2年，进行有关服务贸易和投资的第二轮谈判。考虑到中国和美国也在进行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双方都接受谈判条件后，也将减少韩国的服务产业进入中国的障碍，同时也为韩国企业进入中国创造更多机会。

中国和韩国在文化产业上已经有相关合作，两国已经联合拍摄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中国方面对投资韩国的电影、电视剧产业很有兴趣。韩国的电影产业拥有非常好的技术，包括一些高科技，技术和内容都是韩国方面能够提供的，中国方面主要是提供投资，韩国文化产业对中国投资者是很好的投资机会。

记者：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仅是第一步，您认为在政府和企业在今后分别要承担什么任务？

CHUNG Chul：自由贸易的签订使企业面临更多的合作与竞争，会使企业变得更有创造力。我们不需要为企业担心，不需要告诉企业机会在哪里，因为企业逐利的本能会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找到新的机会。对于政府方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双方之间的信任和声誉，这对于中国政府和韩国政府双方都是一样重要的。因为如果在合作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有损声誉，对双方都是损失，相反，如果建立起了较高的声誉，那么也将有利于后续更深入的合作，以及和新的贸易伙伴签订协议。另外，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变化非常快，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政府政策的制定需要及时地跟上企业的需求。

记者：中国政府和企业合作的一个典型是“温州韩国产业园”，在那里，政府帮助引进许多韩国的服务机构和提供韩国产品的消费场所，您认为这种形式怎么样？

CHUNG Chul：我认为这种形式非常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所承担的职能是不一样的，建立类似于自由贸易区的场所是个非常好的尝试，建立越多类似的场所，越有利于政府和企业从中获得经验，完善协议中的内容。

记者：您认为FTA和“亚投行”能在哪些方面产生协同效应？

CHUNG Chul：亚投行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与“一带一路”关系较为紧密，在一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进行投资，帮助其建立起铁路、公路、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FTA是中国国家战略的另一部分，促进中国与各国的贸易和投资。FTA的投资经验将会对亚投行的投资有帮助，也可以在亚投行之后进行后续的投资和建设，加快被投资国发展进程，提高投资回报。亚投行也会促使更多国家签订FTA，并且在合作程度上走得更远。

大气污染：如何在更清洁的战略下实施发展？

记者：Katherine Gagen



Aaron J. Cohen

华盛顿大学健康影响研究所（Health Effects Institute）首席经济学家、健康计量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兼职教授。在健康影响研究所（HEI），Cohen 管理着一个针对大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流行病学研究国际项目，并参与开发和管理健康影响研究所（HEI）的美国和国际研究项目。

「即使工厂搬迁到了郊区，而其排放并没有减少，那么一定量的污染仍旧会传播回来并污染城区，所以我认为，除非让这些工业更加清洁，否则这就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甚至也不是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

记者：受过去几十年大气污染的影响，全球各地的健康状况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Aaron J. Cohen：各地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些地区在最近几十年里空气质量已经改善了，相应的，其健康状况也改善了。而另外一些地区在过去二十年里，空气质量恶化了，而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还伴随着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由于受到大气污染的影响而患上了疾病，例如心脏病、肺病等，这导致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地方出现了严重的健康负

担。但同时令人鼓舞的是，这意味着，如果存在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的国家采取之前已经在别的地区，例如美国，成功实践的措施，并且实行管理空气质量的计划，这将带来极大的裨益。在中国，人们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来实现上述目的。

记者：大气污染对全球健康的短期影响有哪些？

Aaron J. Cohen: 在短期内，暴露在大气污染中会导致死亡率的增加，并会增加由于心血管疾病和肺病而导致的住院数量。暴露在大气污染中也会加重患有肺病的人的病情，例如有哮喘病的人。

记者：有哪些长期影响呢？

Aaron J. Cohen: 在长期内，如果你所居住地区的大气污染加重，将会增加你患上心血管疾病和肺病的风险，包括肺癌，最终导致寿命的缩短。这些也是导致全球和中国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不知读者们是否知道，就在一年以前，国际卫生组织的一个下属机构，国际癌症研究署（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在对目前可以获得的科学证据进行了详尽调查之后确定，暴露在一般大气污染中，特别是暴露在空气颗粒物中，会引起肺癌。另外，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正在更深入地研究大气污染可能导致的疾病，包括早产、低出生体重和糖尿病。

记者：您提到了空气颗粒物，我了解到您研究了空气颗粒物作为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中国的空气颗粒物水平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Aaron J. Cohen: 是的，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和京津冀地区。

记者：您认为这种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Aaron J. Cohen: 这与经济发展有关。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让大量人口脱离贫困，从而也改善了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

人的平均寿命一直在增加。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空气、水和土壤质量恶化为代价来实现的，而这又导致了平均寿命的减少、并侵蚀着经济发展的红利。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美国和欧洲，基于他们的经验和可用的环保技术，人们希望高速发展的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对环境的损害以及因此带来的对健康的影响。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将来所要做的事情。中国也理解这些，并且正在采取措施来实现这些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我所说的内容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或困惑，尽管经济发展已经导致平均寿命增加了，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现在正在起到相反的作用。

记者：这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

Aaron J. Cohen：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预期寿命取得了重要的实质性进步，然而如果不是因为污染如此严重，这个进步会更大。在我明天的谈话中，我将会展示一些关于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Disease Burden）的近期数据和初步估计，这些将会证明一些观点。

记者：如果空气质量没有改善，中国在将来会面临哪些挑战？

Aaron J. Cohen：我们已经讨论过其中的一些内容了。很明显，以煤炭作为燃料的经济发展，无论其成果多么显著，请别介意我这么说，那种形式的发展不能持续，因为它对人民的健康有害。

记者：您是否听说中国将很多工厂搬迁到郊区？您对此如何评论？

Aaron J. Cohen：我不是政策专家，但我认为其总体目标应当是为了减少人群在有害于健康的大气污染中暴露的机会。大气污染是可以传播的，所以，即使工厂搬迁出了北京，例如搬到了河北，而其排放并没有减少，那么一定量的污染仍旧会传播回来并污染城区，所以我认为，除非让这些工业更加清洁，否则这就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甚至也不是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因为将重污染工业转移到其他地区却又不使其更加清洁，这并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

记者：您也简要地谈到，在将来，我们应当转向更加清洁的发展战略。

Aaron J. Cohen：是的。顺便提一下，当我提到我们的时候，我是说所有人。我想中国现在正在采取的措施恰恰是在那个正确的方向上，很明显，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限制煤炭的使用，这非常好。但是并不仅仅在中国是这样，在美国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我们只能自己去做。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存在着政治角力。

记者：您认为一个国家使用更加清洁且对环境影响更小的技术来实现发展可能吗？

Aaron J. Cohen：这取决于你所提到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是在问，该国居民的生活能够改善吗、能够消除贫困吗？是的，我想可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关于政策的问题，并且需要时刻谨记目标是什么。再一次重申，这是我的个人观点。我认为，现在有些国家正在非常快速地，或者说，尽可能快速地，转向可再生能源，但是就我所知这些国家并不处在同一发展水平，这些国家都是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设定了一个尽可能清洁的发展战略，并且那些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国家如果能应用现在的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最新技术的使用，那么他们就不必去经历其他国家曾遭遇过的极端污染的阶段了。我不相信当前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我们以更加清洁的方式来实现发展。人们并不需要重复过去的错误，例如污染，这并不是发展的必然代价。再一次重申，这些并不是专家意见，但是我想已经有足够的例子来证明这是可以实现的。

记者：我们简要地提到了这点，但从中国的具体背景来看，过去一些年中您看到了哪些大气污染带来的影响？

Aaron J. Cohen：大气污染提高了人们的死亡率并缩短了人们的预期寿命。在中国许多造成人们死亡和残疾的主要疾病都是受大气污染的影响而导致的；中风，一度成为在中国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心脏病次之，同时还有

肺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肺病，儿童和成人肺炎，以上这些都是造成死亡的原因。不过大家显然知道，关于造成肺癌的原因，特别是其主要原因，并不是户外大气污染，而是吸烟，这也是中国的一个主要问题。

用社交媒体更好地实现政民沟通和为民服务

记者：王震宇



丁利民

现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上海发布办公室主任。由他们团队打造的“上海发布”，是目前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政务新媒体之一，微博粉丝总数超过 1160 万，微信粉丝数超过 110 万。

「社交媒体的出现，对政府而言，带来的最大的机遇，是为政府提供了突破传统信息公开和传播途径的可能。而最大的挑战是：政府要直面民众的诉求，及时回应和有效沟通。」

记者：您认为在社交媒体时代，政府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丁利民：社交媒体的出现，带来的最大的机遇，是为政府提供了突破传统信息公开和传播途径的可能。

以前，政府信息公开主要基于一些传统的手段，比如市民从东方书报亭等获取政府公报。由于公报有一定的出版周期，时效性相对较弱。第二是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单向传播居多，和网民实时有效的互动较少。第三是通过媒体进行信息公开，由于媒体会从各自的定位和角度进行信息筛选，最终可能无法帮助政府实现全面、完整的信息公开。而有了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后，政府可以有直接的途径与民众进行对话和交流，促进政务信息更加有效地到达和传播。

至于挑战，我个人的体会是：有了政务新媒体之后，政府会更加直面民

众的诉求，需要及时回应和有效沟通，这会倒逼政府效能的提升。比如现在某个地方或某个领域发生了突发事情，只要相关区县、部门有政务微博或者微信，网民就会直接在网上与政府进行对话和交流，需要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回应。另外，目前政务新媒体发展很快，数量也很庞大，但是政务新媒体要很好地与网友进行对话和交流，可能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沟通与表达方式的创新。

记者：您曾说过，“在服务中有效引导舆论”是上海发布的宗旨，那么您认为，政务新媒体的定位是什么？它的服务特点又有哪些？

丁利民：政务新媒体其实与媒体的定位是不同的，它是以促进政府信息公开，推动政府部门实体工作作为出发点，而不像媒体追逐新闻热点、追求影响力至上。

而政务新媒体的特点，首先就在于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发布权威政务信息。上海发布有60%的信息都是政务信息，而且会通过极其严格的程序去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以此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彰显政府的公信力。上海发布每年都会参与“两会”等重要时政会议，还有陆家嘴论坛、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书展等重大活动，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将信息及时传递给网友。

第二，是强化信息服务，特别是体现贴近性和互动性。首先，是特别注重有关民生信息的发布。其次，我们会利用微博平台互动性强的特点，对上海城市发展和管理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听民意、聚民智”，汇总给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作为治理决策的参考。比如公众关注的“黑车”整治问题，我们就通过微博微信进行了意见建议的征集，并及时反馈给交通部门。

第三，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及时发声，回应社会关切。我们会努力做到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以权威、确定的信息来源回应社会关切，消除谣言滋生的土壤。另外我们也会通过政务新媒体群，分级相应热点事件，比如说有些发生局部的突发事件，我们会联系相关区县或部门的政务新媒体，联手做好信息回应。

第四，充分运用微信功能开发，创新便民服务。得益于微信平台开放给公众号更多的权限，以及上海政府部门良好的信息化基础，我们把与市民生

活密切相关的13项便民查询服务功能搬到了“上海发布”微信。市民只需在微信上滑动指尖，就可以轻松查询公交实时到站、公积金账户余额、实时路况信息等民生信息。还可以在网上预约护照办理、婚姻登记等民生服务。

记者：现在市民们最关注上海发布的哪个版块？您认为这反映了什么？

丁利民：从运营实践看，教育、医疗和交通是市民最关心的领域。而最受关注的板块是整合了13项便民查询服务功能的“市政大厅”板块，目前访问量已经达到4300万。仅公交到站实时查询这一项，两个月就已经超过了1000万的访问量。由此可以看出，与市民生活工作密切相关的信息，是他们最需要的，能够为市民生活带来便利的功能服务，是他们最欢迎的。

记者：作为政务新媒体，您和您的团队是怎样识别用户需求，从而提供对应服务的？

丁利民：首先，在我们的用户中，30岁以下的本地年轻用户占到七成，而我们上海发布的团队成员基本也是80、90后，都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普通市民，与受众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在每条信息发布前，我们都会站在市民的角度，对信息做一个预判：市民对这样的信息有没有需求、会不会感兴趣？这样的信息表达方式是否能为受众接受？如果我们自己也认为，发布的内容对生活有影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信息，那么我们就觉得这个一定要发，并且会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形式将它传播出去。

其次，我们会根据数据反馈和调研来识别用户的需求。比如，去年10月开始力推的便民查询服务功能，我们并不追求大而全，而是聚焦市民高频次的服务需求，结合相关委办局的信息化情况，通过技术对接和适应性改造，最终将它们搬到微信平台。应该说，随着便民查询服务功能逐渐增多，集群效应也日益显现。现在，也有不少政府部门会主动与我们沟通，希望共同把市民有高频需求的一些服务搬到移动端。

记者：您认为在新媒体时代下，对公务员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

丁利民：就我们上海发布的团队来说，首先，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熟悉新媒体，并且自己要能熟练运用新媒体。如果对新媒体一无所知，怎么可能应用新媒体为民服务呢？

其次，要关注趋势性的变化。在微博依然火爆的2013年，我们就推出了政务微信。实践证明，捕捉到趋势变化，踩准了节拍，政务微信的运营和推广就比较顺利。试想，如果拖到现在才推出政务微信，最好的时机可能就错过了，也不会有现在的效果。这说明在新媒体时代，我们需要对社交媒体保持密切关注和一定的敏锐度，对其发展趋势尽可能有前瞻性的观察和研判。

第三，注意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的转变。政府系统以规范性的工作语言居多，但如果把这样的语言照搬到网络，网友可能就会觉得和我们的对话完全不在一个话语体系里，就很难取得良好的沟通效果。所以，这要求政务新媒体的运营团队要熟悉网络语言，能够使用网民熟悉的话语体系，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完成政务信息的发布和解读，实现更好的政民沟通。

环境问题：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公民之间的交锋

记者：胡京晗



Shukmei Ho

现任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环境健康系主任，医学院基础研究副院长，肿瘤中心主任，美国国立卫生院下属环境遗传学中心主任，环境健康、肿瘤及相关领域的世界知名学者。

「在影响数百万人的问题上进行决策时，政治家、工业界以及政策制定者需要信任科学家同行的研究。」

记者：您工作生活的辛辛那提市早在1881年即进行了保护空气质量的立法尝试，1955年又出台了《空气污染控制法》，并后续完善为《清洁空气法》。您认为美国的立法实践能提供中国哪些经验？

Shukmei Ho：虽然辛辛那提市目前仍有空气问题，但没有亚洲这样严重。美国的立法涵盖了至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我想是值得与中国以及其他受空气污染困扰的国家分享的经验。

一方面，自上而下的路径包括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以及工业界，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支持十分重要。公民以及科学家能够提高公众意识，并且有权利选举新的官员。他们可以保证官员听取公众意见并且相应改变，“不听话”的官员将失去他们的选票。虽然中国的情况不完全类似，但是我相信公民的参与和支持对于长期的社会改变有重要影响。

空气污染的治理需要系统性的努力，包括环境工程，能源，交通，公共卫生以及政策和法律。另外，由于空气污染具有跨境传播的属性，全国的甚至全球的立法实施将比一个城市的努力更加有效。

记者：目前中国社会在环境问题上普遍聚焦雾霾。我们看到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的不同程度的空气污染，比如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您认为生态环境上的退步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您怎样看待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

Shukmei Ho：快速的城镇化常常伴有加剧的污染物排放，这发生在很多国家。但是，依赖于现有技术水平的污染控制应该致力于最大化地减少污染程度。

每一枚硬币都有正反两面。雾霾同时也促进了清洁能源以及高级空气净化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我们的环境在很多方面是十分脆弱的，但是通过计划以及实践我们可以取得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平衡。

记者：您在2006年的一篇高影响力文章中探讨了环境中双酚A与男性前列腺癌等人群疾病的关系。您怎样看待科学研究到现实政策的转化？

Shukmei Ho：在影响数百万人的问题上进行决策时，政治家、工业界以及政策制定者需要信任科学家同行的研究。

我们在2006年发表了关于在日用品特别是塑料制品中广泛使用的双酚A对前列腺癌变作用的报道。最开始的政府反应是非常好的：邻苯二甲酸酯被禁止，尽管双酚A没有被禁止。加利福尼亚州率先通过有毒玩具法案，不允许为3岁以下儿童设计的玩具中含有化学成分邻苯二甲酸酯。这说明政府开始理解这类化学物质对人的长期影响。目前，美国有13个州制定了对双酚A的相应管理措施。不过，联邦政府至今不接受双酚A对人体健康有长期危害的观点。EPA（美国环境保护局）两次组织开展对双酚A的研究，但是每次均以实验动物不够多、数据不够充分等理由而拒绝承认其健康影响。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是一样的态度，认为证据不够充分，尽管科学工作者发表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证据，尽管有大量环境人群显示出双酚A的健康危害。我们看到一些欧洲国家和加拿大已经禁止了双酚A，虽然这个化学物质同样为这些国家的工业带去巨大利润。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们应该如何行动？

Shukmei Ho：我认为科学家应该与具有相似想法的公民团结起来。

公共宣传和媒体关注是第一步。社会意识和预防措施是治理污染的一个关键因素。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每个人都愿意生活在蓝天白云的环境中。对更高空气质量的追求是环境意识和环境健康进步的推动因素之一。公民的力量从某一层面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说，如果公民拒绝购买某一的商品，那么很快随之产生的经济的力量将克服各种短期利益行为。

现在，有一群科学家在专注于商标扫描的应用软件开发。人们可以通过扫描商标来了解产品包含化学何种物质的信息。消费者据此进行自己的消费选择。其中一个APP叫做“Think dirty buy clean”。当你扫描完商品条形码后，APP会提供你一个从1到10的参考评分。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动员社会。

记者：关于您提到的APP，它的应用需要大数据的支持。大数据是现在很多领域都很火的一个词。您对大数据在环境健康领域的价值如何评价？

Shukmei Ho：大数据是很有用的。通过这些APP，科学家可以追踪人群，并且从中分析人们的健康如何与其周围环境的各种暴露因素相联系。

大数据在表观遗传学和环境健康上的应用是目前研究中非常热门的一个领域。分析和处理成千上万家医院的数百万人的健康和临床记录可以创造完美的转化和表观遗传学研究和环境健康及医药上的新的发现发明。

记者：在基础研究转化方面，您对中国的环境科学家有什么建议？

Shukmei Ho：我认为，环境科学家应该更加专注于研究可应用领域。比如，发展能够检测人群所处环境的各种暴露因素的理想技术，兼具敏感性和特异性；大数据在人群的临床记录，基因组学和表观遗传学中的应用；清洁环境、处理废物以及生产绿色化学材料等。

另外，我想环境类药物将会是中国未来几十年中一个重要的领域。由于环境能够对人类健康和疾病发展产生长期影响，中国的相关政策会发生改变，疾病模式也会相应发生改变。

催化和支持作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

记者：金忆茗



Frank Jannuzi

于 2014 年 4 月加入了莫琳和麦克·曼斯菲尔德基金会 (Maureen and Mike Mansfield Foundation),担任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他之前担任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的副总干事(法务、政策和研究)。他现在作为国际事务政策和政治专家,以东亚和太平洋事务政策主任的身份为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John Kerry 工作。

「美国一直在通过其轴辐型安全架构政策在亚太安全方面起到领导作用,而在将来,美国的作用将更多地被描述为催化性质的作用,也就是说,美国应当促进在亚洲形成有效的多边安排,来帮助解决像是恐怖主义、海盗、流行病和流感这样的跨国问题,或者是解决涉及到大国竞争的问题,而上述问题很难由亚洲内部解决。」

记者：正如您之前所提到的，美国并不是一个亚洲国家，但是确实一个太平洋大国。您如何界定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是一个领导者、协调者还是守护者？美国现在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到了亚太安全事务中？

Frank Jannuzi：在过去七年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一直在通过其轴辐型安全架构政策在亚太安全方面起到领导作用，而在将来，美国的作用将更多

地被描述为催化性质的作用，也就是说，美国应当促进在亚洲形成有效的多边安排，来帮助解决像是恐怖主义、海盗、流行病和流感这样的跨国问题，或者是解决涉及到大国竞争的问题，而上述问题很难由亚洲内部解决。美国可以起到一种支持性的、催化性的作用，来推动关系紧张的大国之间的对话以及和解。这是我对未来的希望。

记者：关于日本，新的双边防务纲领允许日本在亚洲地区以及亚洲之外的地区内在美国领导的军事行动中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您如何评估其对其他亚太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影响？这会对其邻国构成威胁吗？

FrankJannuzi：我相信美日同盟不会对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而且当然也不会对其邻国构成威胁。美日同盟的变化主要是涉及到日本在特定情况下协助美国的义务。例如，如果朝鲜向美国发射了导弹，在过去，日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来击落该导弹，因为日本并没有遭受到直接攻击。这是个荒唐可笑的情况。如果美国和日本是同盟，那么日本就应该有权利来使用其武装力量击落该导弹，但是直到最近，日本一直没有该权利。因此，美日同盟的变化涉及到日本向美国所承诺承担的一系列互惠的且更加平等的义务。这绝不会让日本成为一个更加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因为美国一直致力于日本的防卫，而这一点没有改变。

记者：其与军费开支有何关联？

FrankJannuzi：美国持续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其军事防卫，但是，公平地说，美国希望其安全盟友为共同的安全目标而公平地分担军费开支的相应部分，并且要求日本在地区和全球安全方面做出更多贡献。但是，请注意，中国在过去十年里每年以15-17%的增速来增加其国防预算，而日本的国防预算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在缩减。日本仅仅在其防卫上花费了1%的GDP，而中国则花费了将近6%。在新的防卫纲领规定下，日本将只能在其国防开支上增加非常小的量，并且其将仅仅能够达到逆转在过去二十年来其国防开支持续下降的程度。所以，这不应该被解读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每次我听到

我在亚洲的朋友们谈论日本军国主义，我都要提醒他们，日本没有导弹，没有航空母舰，没有战略轰炸机，也没有核武器。很明显，日本不对像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构成威胁。

记者：至于朝鲜半岛，我注意到，您在您于1999年发表的文章中已经评估了美国能否引发朝鲜崩溃的可能性。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过程中的立场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Frank Jannuzi：当然，美国和朝鲜现在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下。虽然我们之间有停战协定，但是我们之间已经斗争了七十年了，而如果您看过任何朝鲜所发布的报道，您就会知道他们一直把我们形容为敌人。他们谈论着我们的敌对政策，他们嘲笑我们的领导力，而且他们诋毁我们在世界上所起到的作用。他们使用非常不好的语言来形容我们，但是我们并不经常使用不好的语言来形容朝鲜。

称呼他们为敌对力量仅仅是对战争状态的恰当描述。我们仍然处于战争中。这是一场需要被永久终结的战争，而并不仅仅是签订一份停战协定，而同时需要签订和平条约。美国与朝鲜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我们承认他们，我们与他们打交道，我们接受他们作为联合国成员国。而美国并不想要看到朝鲜这个国家因武力手段而解体，美国确实希望最终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而我想说，这也是朝韩双方的朝鲜族人民的共同希望。在支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方面，美国现在的立场与朝韩双方的朝鲜族人民的立场是一样的。

现在，朝鲜不应该寻求核武器。其受到联合国的多边制裁，而这也是受到中国支持的，寻求核武器、发射远程导弹，上述两个行为不是对朝鲜的邻国构成了威胁，就是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我希望人们能够关注于此，并且敦促朝鲜接受要求其停止导弹测试和核试验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如果他们接受了，那么美国将会非常高兴地与他们坐下来，并尝试就结束战争和外交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

记者：在过去一些年里，中国时常卷入关于南中国海诸岛和钓鱼岛（尖阁诸岛）的争议中。随着中国作为新兴力量的崛起，您是否认为中国应当使用其力量来在周边安全方面保卫自己呢？

Frank Jannuzi: 首先,我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成就致以崇高的敬意,而这些成就并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有巨大的价值,同时也对世界有巨大的价值。通过消除贫困和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已经在过去35年里成为了增进世界福祉的重要力量,而我希望在接下来的35年里,中国仍继续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进行投资,并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大举投资。我支持AIIB。在亚洲存在很多的基础设施问题,而我认为,如果能够遵循在透明度和兼容性方面的良好的国际惯例的话,则AIIB可以提供帮助,所以我对此表示欢迎。

我认为,中国在消除人们关于其将如何使用其新力量的忧虑方面可以做的主要的事情仅仅是,努力寻找与其邻国和美国的共同点,并以该共同点为基础。例如,我们在共同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伊朗核问题,而我们可以继续为此而一起合作。而不是仅仅关注于文字表述,例如“中国的和平崛起”,而这些文字需要转化为实际行动。中国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新丝绸之路倡议和铁路连接就是尝试将这一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例子之一,但是我们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而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以共同点为基础,则其将会消除存在于华盛顿和其他地区的对中国意图的猜疑。

也有人对中国将如何使用其力量感到担心,中国已经成长到如此巨大,并且成长得如此迅速,人们对是否可以信赖中国没有信心。军费开支的增长并不十分透明,而且人们对其目的并不确定。而消除这些疑虑的主要办法仅仅是通过中国的行动,但是现在,在中国南海的行动已经让很多华盛顿的人们对中国正在试图发展其以军事手段实现其领土要求的能力而感到忧虑。

记者: 美国和中国是否可能在中国南海发生冲突?

FrankJannuzi: 我认为这不太可能导致发生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直接冲突。美国在中国南海没有领土要求,尽管美国的盟友菲律宾在中国南海的部分地区有领土要求。我相信中国会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些争端,并且如果中国使用武力来解决这些领土争端的话则其国际声誉将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因为领土争端在这里实际上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更多的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的负责的成员的象征性含义。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已

经受到了很多国家的谴责，包括中国。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相信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力量而行事，并通过非强制性的方法来和平地解决争端。

记者：您对中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的争端如何看待？

Frank Jannuzi：同样的。日本一般将钓鱼岛看做是日本的领土，然而那些石头实际上并没有战略意义，这仅仅是一个荣誉问题。国家之间不应该仅仅因为荣誉这样的问题而相互发动战争，尽管他们也这么做。古希腊历史学家修西狄底斯曾说过，国家之间发动战争是由于三个原因：荣誉、恐惧和利益。至于钓鱼岛这个问题，如果是因为利益，那么双方之间就会和平共处，因为那些岛屿并没有战略价值。但是，荣誉问题的影响很大，并且应当由北京和东京以外交手段解决。如果他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只能保持理性并搁置争议。在那里的海床之下并没有资源，并且即使是有资源，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钓鱼岛也不能控制200英里领海基线。即使如果中国或日本控制了那些岛屿，这也仅仅是一个荣誉问题，而没有任何利益牵扯其中。

但是，在中国南海，存在利益。中国南海是一片更大的区域，领土意义更大，并且海底资源更加丰富，所以有更多的利益处于博弈之中。但是钓鱼岛仅仅与荣誉有关，两个国家都应该更加的负责任，将他们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将荣誉问题搁置一边。

记者：在您的文章中，有一个预测，中美关系将很可能决定21世纪。那么，在习近平-奥巴马的时代，您如何解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其将如何影响亚太事务？

Frank Jannuzi：有一些关于大国关系的新模式的事情是美国人民和奥巴马都确定赞同的，并且美国人民也相信，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对美国来说并不意味着零和游戏，该零和游戏中会涉及到美国力量的衰落。美国欢迎一个崛起的中国，并且这也对整个世界有好处。在19世纪存在很多大国对抗，这是真实的，而德国的崛起被英国看做是威胁。而在今天，中国的崛起并不一定是威胁，尽管在新模式中的某些方面美国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习近平谈到，“充分尊重彼此的利益”，而这听起来像是美国和中国应当接受类似于门罗

风格 (Monroe style) 的势力范围，而这并不是美国所欢迎的概念。我不确定习近平的真实意思，但是我想，美国仍然不太清楚中国到底在寻求什么。美国并不是要表达这样的意思，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大国，而我相信，对于习近平本人来说，他可能会支持一个多极世界，并且这更加符合中国在世界上的表现。但是，当他谈到大国关系新模式的时候，看起来，其仅仅适用于美国和中国，而这引起华盛顿的些许困惑。

记者：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将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Frank Jannuzi: 我想，中美关系中有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美国的两大政党都有个坏习惯，那就是针对不同的问题而指责中国。这很常见：比尔·克林顿在老布什当政期间对其对华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而在他当选总统之后，他就改变了他的观点，并支持良好的中美关系。在8年后，小布什对民主党进行了猛烈批评，认为其对华过于软弱，但是在他当选总统之后他就改变了立场。而在2008年，即使是奥巴马总统在与共和党人的竞选活动中，他也因共和党人没有为争取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与中国抗争，而是允许中国获得巨额的贸易顺差，操纵其货币并夺走了美国人的工作而批评他们。但是当他成为总统之后，他大力地支持与中国的战略和经济对话。

因此很不幸，每隔四年或八年，美国政客们就因为一些问题而指责中国，这很常见，而我可以肯定地说，在2016年将会出现对中国的一些指责。共和党人会说，奥巴马允许中国扩大其影响力，而以牺牲美国为代价，他们可能会就中国南海问题而指责奥巴马过于软弱，他们可能会就没有为中国的人权问题而做足够的抗争而指责希拉里，而且他们可能还会指责希拉里对中国不够强硬。但是，如果共和党人赢得了2016年大选，他们也同样会与中国做生意。他们会尊敬地对待中国，因为这就是现实，而我们必须一起合作。

我想，下一任总统将不会对美国对华政策做任何重大改变，但是我确实认为，不论是谁当选，美国方面肯定会更加强烈的要求中国尊重多边法律并通过谈判来解决争议。由于中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强大，美国将希望中国进一步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并且，在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和中国人民的劳工权益等领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论谁当总统，都会在努力促进中国在上述这些领域内做的更好而投入很多精力。

记者：相应地，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美国在亚太地区政策方面的重点将是什么？

Frank Jannuzi：美国的基本政策有三个组成部分：1）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强化与我们传统盟友的关系。不论是共和党人做总统还是民主党人做总统，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他们将继续在我们的传统盟友方面进行投入：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2）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支持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这包括TPP、东盟地区论坛和我们对APEC的支持，以此来努力强化这些多边组织以帮助亚洲发展和整合。3）第三个组成部分是，与中国的交往，而对此，有些人说包括两个因素：积极的对外交往和以安全政策为目标的劫持行为（hijack for insurance policy）。不论是谁做总统，我们的对华政策都将会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但是同时，如果中国的行为与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则会出现这种劫持行为。我想，下一任总统将考量建立共同利益和劫持行为之间的平衡，甚至可能比奥巴马、民主党和共和党更倾向于运用所谓的劫持行为。与过去相比较，中国的不确定性略微高一些。

记者：您在回复中强调，中国的行为可能会与“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您能否详细地说说，什么是美国的利益？

Frank Jannuzi：第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是推动经济一体化和增长，而具体来说就是，削减关税壁垒、支持外国直接投资和支持贸易增长。

第二，在安全领域，美国的利益就是支持和平，特别是避免在朝鲜半岛出现任何大国冲突，并制止任何形式的军事扩张主义。我想，支持善政廉政也是美国的利益，特别是在像是缅甸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内战已经持续了30年，我们想要支持那里的经济增长和稳定；或者说像是越南这样的国家，在那里，我们试图鼓励他们实行他们自己的“改革开放政策”。

第三，同时，在与中国合作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防止全球变暖方面也有美国的利益存在。中国可以在这方面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伙伴，包括日本，我们是三个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因此我们有责任一起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四，同时，我们在防止核扩散方面也有特殊的利益，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朝鲜核问题上取得进展，否则亚洲的稳定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为我们可能会看到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例如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台湾（地区）也将会发展他们自己的核武器。

数据开放要配合制度和法律的并行完善

记者：徐佳唯



江源富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电子政务处处长。从事电子政务的应用和理论研究工作，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软科学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美联合研究课题，也是多届中国电子政务论坛的主要组织者。

「现阶段，需要注意的是在数据进一步开放的同时，要配合制度和法律的并行完善，一边开放数据一边对制度法律进行完善，要强调的是不仅要重视数据开放的具体做法，还要重视制度法律上的建设。」

记者：近年来，大数据风潮席卷全球，我国政府也应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在政府治理领域融入了大数据思维和技术，您如何看待政府近年来在运用大数据助力政府治理方面的发展？

江源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是我国这一届政府乃至下一届政府都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政府治理现代化中有两个关键词：“信息化”和“依法行政”，我认为这也是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利用数据助力政府治理又是政府治理信息化中的重点，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利用数据助力政府治理，不管是对于当前热点问题（主要是治标），还是对于长期未解决的难点问题（主要是治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它的作用在“治标”和“治本”两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

记者：上海市政府从2004年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成为了全国第一个公开政务数据的省级政府，您对此有何看法？

江源富：目前数据公开是全球化的趋势，是我国政府打造“阳光政府”、“透明政府”非常重要的手段。在当今社会，许多重要的一手数据，如统计数据，人口数据，法人数据，交通数据等，都由政府和政府管控下的国有企业，如电信，铁路，银行等掌握。而这些一手数据的公开不仅仅是“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需要，是公共服务升级的需要，也是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同时还为整个社会的创新提供了基础素材。这些数据公开后，不少社会组织，如民营企业等，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实现大量的增值服务。一方面，这些增值服务给产业升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另一方面，医疗服务、民生工作，这些方面政府一直想做，但存在着难以做好的问题，产业升级也可以帮助政府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好。

上海作为一个一直希望在国际化进程中走在前列的中心城市，在我国率先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很好的选择。我曾接触过上海的一些大数据研究课题，也走访过相关部门，他们在这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当然政府部分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同时上海也有上海的困难，如跨部门协同困难等。对于上海这样管理较好的城市而言，从开始数据开放到能够将数据开放做得较好，也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上海率先在中国开展数据公开工作，我认为这非常有意义，不仅是上海的大事，对整个国家来说都很重要。

记者：您提到上海在跨部门协同方面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近期也有报道称由于动力不足，政府部门之间壁垒森严，存在数据打通难、数据开放严重不足等问题。您认为破解“政府大数据”壁垒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江源富：对于这个问题，我的个人感受是，政府的大多数部门对数据还是持有开放心态的。但是政府的数据不是想开放就开放得了的，政府部门一旦开放数据，必须明确对该数据有何责任与权力，要经过什么程序才能开放数据，财务什么形式进行开放，且要对敏感信息或涉及隐私的信息进行过滤后才能开放。目前制度和法律上存在着很多未明确的地方，这样一来即便政府部门作为数据持有者，想要对数据进行开放，在有些情况下也很难做到。数

据开放后，在社会上造成的反响，产生的后续问题，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很难明确。举个例子，无论是谁的数据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瑕疵，在不开放的情况下，没人知道这些数据存在问题，一旦开放，瑕疵暴露，对于数据开放者来说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至于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协作，不应该说是开放，而应该是共享的关系，这是首先需要做到的，如果政府内部数据都无法共享，去谈对社会的数据开放就更难做到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不是部门间不愿意开放或者共享数据，而是关于责任、权利、程序、规则等不够明确。但若想要在制度和法律都完善之后才开始进行数据开放，也是不现实的。所以现阶段，需要注意的是在数据逐步开放的同时，要配合制度和法律的并行完善，一边开放数据一边对制度法律进行完善，要强调的是不仅要重视数据开放的具体做法，还要重视相关的制度法律上的建设与完善。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关于隐私的问题，您认为政府应如何在确保隐私、机密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带头开放数据，降低公众获取和利用政府数据资源难度和成本？

江源富：对于隐私保护，我国现阶段还处在相对初级的阶段，以前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较少，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数据的海量积累，现在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问题要从三个角度看：管理，法律，技术。在管理上，要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要形成制度。从法律上来说，对于隐私保护，特别是从长期来看，最终还是要靠立法解决。至于技术上，要求鼓励技术不断进步的制度环境，并且技术实施要到位，根据相关管理的要求或法律的规定，如在数据公开前部分信息要脱敏，如何脱敏，就要求技术上尽快就位。这是三个基本的点，只有将这三点就位，那么基于隐私保护基础之上的数据开放才能真正造就一个数据产业。

记者：在《2014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EDGI）位列第70名，是近五年来排名最靠前的一次，您怎样评价近年来中国电子政务取得的发展与进步？

江源富：联合国的EDGI指数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本世纪初期，中国的EDGI指数上升很快，后来中间有过近5、6年的下降时期，现在排名又开始慢慢上升。实际上，这反映了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的客观情况，早期中国EDGI上升很快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中国信息基础化的设施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发展也较快，而当时的EDGI指标主要体现了这样的发展。而中间5、6年的落后，是因为虽然基础设施发展很快，但联合国的电子政务指标开始注重电子政务的业务应用及政府服务。业务应用及政府服务包含了跨部门的业务协同，例如对公民、企业法人的服务等，这些工作，中国是有几年没跟上的，进展也较慢。而经过5、6年的调整，中国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大家也能感受到，这届政府日益看重部门间的业务协同，更多地强调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于民生服务的建设。这两年逐步成效彰显，所以在此基础上，中国在EDGI上的排名又逐渐上升了。总体上来看，我认为联合国EDGI的排名可信度较高，我认为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的实际情况与EDGI指标与排名也比较契合。从这个过程也可以看到，中国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工作要做。

记者：电子政务历来有“三分技术，七分管理”一说，您认为基于云计算的信息技术创新与发展对政府部门的管理水平有什么要求？

江源富：无论是基于云计算还是大数据的应用，政府在信息化领域里要做的事情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现在的问题是，电子政务本身的建设应怎样实现集约化，怎样利用更小的成本实现集约化的建设与运营，使之能够产生更大的边际效应。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还谈不上对政府的整体管理水平做出要求，只是电子政务管理需要适应技术的发展。最主要的是，云计算本身也要实现集约化的建设与运营，对于这一点，政府电子政务的管理方式，特别是政府信息化项目的立项管理工作，需要做出调整，要有一个新的思路。

记者：耶鲁大学布赖恩·福特曾指出：“在最坏的情况下，云计算可能会严重崩盘，以致威胁到任何依赖于它的企业的业务。”您如何看待云计算这一潜在危险对于电子政务平台建设的影响？

江源富：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也是一个管理问题，甚至超前

一些，这还是一个规划问题。随着电子政务的业务不断深入，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对于电子政务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在不断发展。如果基础设施出现问题，整体都会受到影响。目前这一代的政务基础设施与几十年前，百年前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基础设施是集中建设、集中运维、分布应用的，以前的影响可能大多是局部的，现在的影响则更加全局化。当前时期，需要有对电子政务安全有全局的考虑，比如数据和服务都需要备份和异地备份，且要有相关的应急处置方案。举个例子，当年的911事件，物理崩溃是瞬间发生的，有些企业的数据有异地备份，后期恢复就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没有数据备份的公司则受到了较大的后续业务影响。在现代社会，信息化作为基础政务设施，政府需要重点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而现在，政府也的确对这一点非常重视，要做的只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如异地备份，各方都在做，但现在的异地备份需要适度的集中，对于一个省来说，不同城市、不同职能部门都到不同地方建设异地备份中心，既是不现实，也是不经济，更可行的做法是适度的统一实现异地备份。总体来说，这个问题需要整体考虑，统筹规划，解决到位。

记者：对于民营企业，以阿里巴巴为例，今年3月，阿里巴巴宣布推出国内首个面向政府开放的大数据产品——阿里经济云图。您对此有何看法？

江源富：政府目前掌握着大量数据，而当今社会正处于多元化时代，很多企业，特别是大型互联网企业，也有着相当大的数据优势。政府和企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需要实现直序的数据双向开放，阿里的做法是很好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在数据开放这一块需要与政府合作，阿里相对来说占了先机。这一点对于政府的治理来说十分重要，而对于阿里、百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来说，也是他们自身业务的战略成长发展空间。

中国城市外交应整合资源，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

记者：王彦琦



李新玉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际友好城市交流中心主任。国际友好城市交流中心旨在促进国际友好城市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活动，推动民间外交战略的研究与培训工作。

「民间外交很重要，是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而民间外交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城市之间的友好交往进行。城市外交应当保持一种灵活性，统一各种资源服务于国家整体的利益。」

记者：李新玉老师您好。在分论坛上，您具体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友好城市之间的互动。在结交友好城市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公众之间具体有哪些互动形式？

李新玉：公众的互动可以通过经济合作和各种人文交流项目实现。比如各种民间文艺团体的交流，也可以是图片展，比如以“我眼中的你的城市”为主题的摄影展，或是大学之间共建项目，进行互访，从而实现公众之间具体的互动。比如山东省和韩国京畿道之间，两个省的大学联合起来建成大学的联合体，实现高教资源共享。学生可以在这十几所大学里面参与交换，参加夏令营。很多中国学生可以到韩国去学习韩语，韩国学生可以来学中文，实现各种形式的交流。

记者：我们注意到发展对外友好城市的中国城市以东南沿海居多，友协可以通过哪些具体措施来促进我国西部地区同国外发展友好城市？

李新玉：东西部在友好城市发展方面的差异跟中国的整体发展相关。过往沿海地区较西部省份开放程度更高，所以沿海的城市得以领先地“走出去”。现在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事实上有利于推动我国西部地区和沿线国家之间发展友好城市关系。过往中国城市和其它国家的城市结成对子，中国在这过程中向别的国家学习了许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技术经验。现在我们要同西部沿线国家合作，从更多的意义上，我们会在经济合作上发挥一些支持作用。以陕西和哈萨克斯坦的东干族的交流为例，其中的渊源非常有趣。两千多年前陕西其实并没有苹果种植，哈萨克斯坦的苹果种植则非常成熟。陕西的苹果种植资源和技术由哈萨克斯坦引入。可是现在由于气候等各方面原因，哈萨克斯坦的苹果种植衰落，陕西的苹果品质却非常优良。这构成了双方合作共建苹果园的原因。通过苹果园的建设，现在陕西的苹果又带回到哈萨克斯坦。看似简单的交流却给很多老百姓带来直接的利益和福祉，陕西把相关的种植技术经验带到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许多百姓通过苹果种植实现发家致富。所以推动中西部地区对外交往，经济合作的例子有很多。

记者：在高阶政治、官方外交的领域，国家之间常常出现紧张关系。就中国而言，城市之间的交流，在缓解国家间紧张关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李新玉：我认为城市外交是民间外交相较于官方外交的特色的体现。这也是中国老一代领导人智慧的展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并开始推动民间外交。当官方外交紧张时，通常民间外交仍然要继续。它们是相互搭配的关系。民间外交很重要，是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而民间外交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城市之间的友好交往进行。比如中日之间，即使在官方外交紧张时，民间的交往也未曾中断，不断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

记者：在中国的城市外交推动过程中，友协可以整合哪些部门哪些领域的资源，来协同推进友好城市的发展？

李新玉：一方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每个省市甚至许多县都有分支，成立了省友协，市友协等单位。第二方面则是我们和国内各个部门都有相互配合合作的关系。我们接受外交部的工作指导，也整合许多民间资源。整体而言我们涉及的面很广，合作的空间很大，这是由民间外交的特点所决定的。城市外交应当保持一种灵活性，统一各种资源服务于国家整体的利益。

记者：在我国的城市外交中，上海市起着怎样的作用？上海市的城市外交发展有哪些特色？

李新玉：上海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人文特色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很强的优势，是极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市。在国际友好城市的工作中，它本身就汇集了国内外方方面面的资源，包括在建立的友好城市的覆盖面上，表现都可圈可点。为国际友好城市的发展，民间外交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比如今年年初，北美犹太联盟集团一行68人访华，他们都是北美犹太社群中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非常难得。上海市友协把相关的工作做的非常好，最后让北美犹太代表团非常感动。这样的工作体现了上海在城市合作等大大小小的项目上，发挥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和魅力。

记者：您刚刚提到北美犹太代表团，我们知道犹太社群在公共外交、公共关系的领域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您觉得我们对外关系的发展可以向他们学习什么？

李新玉：犹太民族是非常有智慧，非常团结的民族。我们跟他们打交道时就发现，他们做事有执着的精神，比如参加一个活动，他们一定要落实到这件事是几点几分，流程具体如何，对细节的把控非常细致。所以我觉得在对外关系的发展上面，犹太人的执着和智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办好一件事情，不管有多么艰难，都持续地努力，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做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应当学习的精神。

记者：最后想请您谈谈您对上海论坛的印象。

李新玉：我觉得上海论坛办的非常好，在论坛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不管是流程的设置，嘉宾发言的质量，还是整体的安排，都很出色。大会的主题也结合了当前的热点问题和需要研究的题目，非常有意思。十分感谢大会对我的邀请。

北极冰融背后的风险与机遇

记者：曾济人



南正浩

现任韩国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涵盖海洋环境治理、跨国海洋环境事务、海洋科技运用等。他为韩国政府海洋政策的制定做出过许多贡献，并作为韩国代表多次出席过东亚海协作体(COBSEA)会议，世界海洋论坛以及北极理事会会议等国际会议。

「人类对危机的认知确实存在滞后。北极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心理上都很遥远，因此我们对北极未来风险的意识远不及我们对于近海污染这类风险的意识。公众也许在经历极端性与灾难性事件后会意识到环境的脆弱，但那将为时已晚。」

记者：今年您分论坛的主题是“‘冰融相见’——北极生态保护中的亚洲角色”。您能简要介绍一下目前北极所面临的变化及其可能对人类带来的影响吗？

南正浩：北极地区现在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风险，二是机遇。

风险与危机，主要是北极冰川融化正在改变北极的生态系统，比如说导致鸟类和北极熊等动物的栖息地退化、减少。另外，北极地区内的许多人类活动也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例如碳排放、噪音、石油泄露以及污染等。同时，海水温度上升以及海洋酸化这些从全球其它地方转移而来的问题也在发生。

但这些北极的变化同时也给人类带来很多机遇。比方说，由于冰川融化而出现了新的航线。无论是丹麦、芬兰等北极国家，亦或是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与韩国，都会从中受益。北极航线将成为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新航线。另外，人类也将可以在北极开采丰富的石油资源，进行渔业活动等等。

记者：2013年，包括中韩在内的5个亚洲国家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国。有人批判说非北极国家加入北极理事会只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您认为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事务的主要动机是什么？以及您认为亚洲国家能为北极事务做出怎样的贡献？

南正浩：显然，追求经济利益是多数人、公司与国家的优先选择。新航路与资源开采的前景都非常诱人。比起环境保护、污染这些议题来说，多数人对经济议题的兴趣要强烈得多。所以，显然非北极国家加入北极理事会的首要动机是为了从北极获得更多经济机会。

但中国与韩国也已准备好通过提供科研能力来帮助保护北极的生态环境，为北极事务做出自己的贡献。我认为，在北极建立工作组并开展更多的科学研究是亚洲国家参与北极事务的较好方式。

记者：您认为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在北极事务上的权利与义务有哪些呢？它们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

南正浩：北极的许多区域是属于各个北极国家的，包括许多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北极国家有明确的权利去利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资源与空间。任何其它国家对此都无权侵犯。

而非北极国家的权利则来源于“联系”。这种“联系”往往与鲸、海豹、鲨鱼、鸟类等迁徙性动物有关。比如说，人类在北极进行能源开发可能造成鸟类栖息地破坏这样的生态系统损害，那么其影响就会传到世界的其它地方，比如中国与韩国。这是一种我们能看到与解释的联系，而在北极与非北极地区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其它未知的联系。因此，非北极国家有权阻止北极国家损害北极地区。这种联系就是非北极国家的权利来源。

所以，北极国家更有责任保护北极地区内的生态环境，而其它国家则有

权去督促北极国家这么做。但这并不意味着非北极国家有权干涉北极国家辖区范围内的事务。

但是，对于生态联系的认知，并不意味着北极与非北极国家就有了清晰分配的保护任务。北极地区的环境保护还需要更多的关注。

记者：说到提升公众意识，有人认为人类在采取措施缓解环境变化之前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滞后现象，也许要直到某些灾难性事件造成巨大损失之后，我们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南正浩：人类对危机的认知确实存在着滞后。北极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心理上都很遥远，人们对于北极的认识很少，因此我们对北极未来风险的意识远不及我们对于近海污染这类风险的意识。公众也许在经历极端性与灾难性事件后会意识到环境的脆弱，但那将为时已晚。现在确实有人关注环境保护问题，但关注度还远远不够。

记者：讲到未来风险，2013年《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北极永久冻土的融化可能向大气中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加速全球变暖，造成不可逆的损失。您认为这种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吗？

南正浩：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在韩国也是一个研究焦点。没错，更多温室气体的释放正在发生，比我们想象的更多更快。但由于问题的不确定性，以及全球环境因素之间的隐藏联系，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信息与数据进行准确的预测。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2007年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提出海平面已经上升了59厘米，而这个数字在2013年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就飙升到了82厘米。所以毫无疑问海平面正在加速上升，而我们也不知道第六次评估报告会给出什么结果。所以尽管“加速”不等于“快速”，但我个人认为未来确实将发生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

但这里我想说清楚两点，一是北极冰融是缓慢的，海冰在2050年前不会消失。另一点是融化主因是全球变暖，而非北极地区内的人类活动。当然资源开采等活动也会一定程度上引起融化，但只要这些活动被限定在特定点

与季节，其影响就是很有限的，远比不上全球变暖。

记者：那么要规范人类在北极的活动的话，您认为我们是否需要国际性的立法或者公约呢？

南正浩：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话题。我认为北极国家应该不会同意达成约束性的国际公约。它们愿意在北极问题上有各自的立场。由于北极的很多地区是被不同的国家所支配的，我认为它们不会想建立新的国际公约。

另外，要建立规章去限制能源、船舶公司在北极地区内的活动也不容易，因为我们仍然缺乏关于人类活动对北极影响的确切证据。不过我们可以建立一些管理体系，我们称之为预防措施，以防灾难性事件发生。同时我们也需要建立环境评估系统。这些是一些基于我们现有的科学发现与科学技术的策略，而不是立法或者规章，它们之间还是有微妙的区别的。

记者：那么您认为各个国家之间可以怎样合作来更好地保护北极地区的生态呢？以及建立和维持这种合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有哪些？

南正浩：我认为首先还是要开展科学方面的国际合作。另一建议是我们可以基于生态联系来建立跨国界的保护区网络。

以北极理事会的北极动植物保护工作组（CAFF）为例，CAFF的一个目标就是保护鸟类。有些鸟类会从澳大利亚出发，飞过中国与韩国，最终迁徙到北极地区。这就是一种生态联系。CAFF在几乎所有在这些鸟类迁徙路线上的国家都建立了保护区，比如说韩国就有这样的鸟类栖息地保护区。类似的，我认为由不同国家合作建立海洋保护网络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这类行动可能遇到的困难，就是这样的协作网络需要立足于真实存在的生态联系上，而人为的政治性网络则可能没法持续那么久，因为它缺乏维系网络的媒介。真实的生态联系中有媒介把各个国家联系起来，比如说鸟，使得网络易于维系。然而，人为的网络可能易于建立，却因为缺乏具体媒介而难以维持。不同的文化、利益与政策都可能阻碍网络的维系。

记者：最后，您对于北极冰川融化问题与其它北极问题总体是乐观还是

悲观的呢？您对北极的未来怎么看？

南正浩：在冰川融化问题上，我还是有一点乐观的，因为冰川融化比较慢，新航路直到2050年前都不会开辟。而能源开采也受限于冰川融化的程度。

尽管我个人认为未来会有些不可避免的损失，我仍然相信人类，相信人类的力量，相信人类能够制定出相应对策来缓解甚至消除北极环境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

欧洲经验：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该何去何从？

记者：王丹妮



Michael Schmidt

联邦劳工和社会事务部社会保障制度协调员



Arno Bokeloh

社会保障协调员，现已退休。著作：《Die soziale Sicherung der Frau im Rentenrecht: Rechtslage und Reformmöglichkeiten》（《养老金法律中的女性社会保障：法律地位和改革的可能性》）

「当前的亚洲，尤其是中国，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背景中。协同与合作，而非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欧盟已经确立了自己在集体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主导地位，然而欧盟各成员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却不尽相同，那么这些不同的制度是如何互相协作的呢？

Arno Bokeloh: 事实上，不同成员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所有不同的制度相互协作，而欧盟各项规定的作用即确保这些制度有序协作并避免因人们在一个以上成员国工作而带来的弊端。其采用的一大机制为提倡使用合计期限。如果一个人在德国工作了10年，又在法国工作了30年，则计算出合计期限，因此该人既可享受法国的养老金，又可享受德国的养老金。采用合计保险期限，这就是协作的一大最重要机制。还有一项称作“福利金以现金方式全额出口”（full export of benefits in cash）的规定，这与一个人居住在哪个成员国无关。例如，丹麦人，他们通常不会出口，但是退休后选择居住在西班牙，这是很常见的，欧洲的出口条例要求全额出口至其他成员国，比如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或德国。欧盟法律规定了提供社保的国家。这与一个人在哪个国家工作有关，这个国家也是提供社保的国家。举个例子：一个比利时人居住在法国，拥有荷兰国籍，而工作地点却在德国，那么他将根据德国法律享受社保。这与一个人的实际工作地点有关。这一机制可以避免移民工人问题。

Michael Schmidt: 欧洲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且很难说20或30年后这些制度会否同化。因此，我们所谈论的是协作，而非统一化。

记者：在协商过程中最困难的是哪一方面？成员国是如何达成共识的？

Arno Bokeloh: 作为欧洲机构之一的行政委员会负责讨论协作改善方法。

记者：“欧洲社会基金”（ESF）和“机构”在集体社会保障制度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它们是集体制度的基础吗？

Arno Bokeloh: 欧洲社会基金并非社保制度的资助基金，但它的宗旨是促进没有技术的人员就业。如果你认为它是社保制度的资助者，这是个误解。

Michael Schmidt: 这是欧洲协作的另一方面。

记者：欧洲社会基金（ESF）旨在有效地降低失业率，那么造成目前意大利、希腊等欧盟成员国失业率偏高的最合理原因是什么？

Arno Bokeloh：这是国家自身经济结构带来的问题。

记者：那么意大利或希腊的失业人员为什么不来德国工作呢？

Michael Schmidt：他们事实上是来的，并且很多人都这么做。他们有权在德国、法国或比利时工作，且无需经过任何特殊许可。

Arno Bokeloh：欧洲有内部市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劳动者和个体经营者的自由。比如说，你是意大利的一名劳动者或个体经营者并且未在意大利签订任何合同，那么你就可以到任何一个成员国找工作。

Michael Schmidt：因为德国的就业形势非常好，失业率在7%以下，才6.7%。但意大利的失业率达到了20%，而西班牙则为25%，如果人们不来德国工作的话，这一比率可达到50%。在最近2年中，德国的净移民人口达到了40万人，多数来自其他欧洲国家。

记者：欧洲其他各国的求职者大量涌入德国，德国政府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Arno Bokeloh：德国公司需要技术工人，比如IT专家。德国欢迎来自欧洲其他各国的劳动者，而在一定条件下，也欢迎来自中国或印度的劳动者。后者须获得特殊许可。而高技能人才可优先获得这类许可。

记者：德国将面临哪些社会和政治问题？

Michael Schmidt：德国有很多外来人口，这是一个机遇，同时也是一个挑战。因为这些外来人口必须学习语言，但他们也把自己的文化带到德国。

我认为这对德国而言更是一个机遇。德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多民族国家，有16%的人口来自世界各地。而且我认为德国政府已采取各种措施让这些外来人口有归属感。德国已与其他国家签订了诸多双边协议，例如，德国社会保障部部长已与西班牙政府举行会晤并签订了备忘录，以降低西班牙的失业率。德国还向新移民提供职业培训和实践。这是德国的优势领域，它将学校教授的理论与公司实践相结合。

记者：这种机制会引起社会问题吗？因为我发现有时候新来求职者的社会地位很低。

Arno Bokeloh: 如果这些人没有工作的话，就会带来社会问题。在德国，只有劳动者可享受自由流动。如果这些人在原籍国失业，他们可以到德国找工作，但如果在德国失业，就不会享受补贴。

Michael Schmidt: 但实际上，从意大利或西班牙来德国就业的年轻人是很上进的。他们想要工作，想要学习。他们想有事可做，而不是待业。有问题的不是德国，是他们的原籍国。希腊的优秀人才来到了德国，这让希腊失去了部分专家，也给希腊带来了经济问题。

Arno Bokeloh: 我同意，人才流失是一个主要问题。比如，罗马尼亚，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如果一名罗马尼亚籍医生来到德国，他的收入可能是在罗马尼亚的十倍。但罗马尼亚很可能急需医生人才。所以这对罗马尼亚来说是损失。而如果他们有机会来德国的话，他们就永远不会回祖国了。

Michael Schmidt: 而且我知道这并非单单是欧洲面临的情形，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的。也有从非洲到德国来就业的医生，他们再没回过祖国。

Arno Bokeloh: 的确，在非洲的一些国家，医生人口比例可能是1:50000，但德国的这一比例大约为1:500，这就给这些非洲国家带来了问题。

记者：中国国内的劳动人口流动性也很高，上海等目的地城市面临着来自中国其他各地的外来人口的严峻压力，那么在这方面德国可以给中国哪些经验之谈呢？

Arno Bokeloh：我认为，社会保障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提高农村地区的吸引力具有重要意义。到上海、北京、东京或首尔就业的趋势引发了许多问题。我认为完善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为重要。

Michael Schmidt：问题是中国的农民工数量庞大。我已经去过中国很多次了，中国有1.52亿人口涌入大城市。这些人面临着十分艰难的就业形势。比如，有个安徽人到上海来就业，这是经过理性思考后作出的决定。因为安徽的就业情形不如上海。这个安徽人并不冲动。他在上海赚得多，每个月往安徽老家寄点钱。要禁止这种情况可以说很复杂。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人们就只享有故乡所在地的社保。安徽到上海就业的劳动者无法享受上海的社保。

记者：是的，这引起了很多问题。而且农民工的孩子也没法在上海念书。

Michael Schmidt：是，如果不改变上海的这种情况，就没法解决问题。我在陈述中说过，中国有75%的农村人口，但实际上，50%以上都居住在大城市中。在中国，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城市有100多个。而留守在农村的人越来越少。但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发生了巨大变革，我希望这些改革能够在未来几年内改变这种情况。

记者：在未来十年内，德国在社会保障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Arno Bokeloh：德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老龄化和低出生率。步入老龄化的人口越来越多，政府需支付的养老金也日益增多，但出生率却很低。

Michael Schmidt：我相信欧洲大部分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正如Arno所说，人口结构变化造就了所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保险制度和养老

金制度。此外，这也是长期护理问题。因为在德国，当你步入老年，就可享受长期护理。长期护理计划始于1995年，当时覆盖了160万人，现在已经发展到260万，在过去20年中早呢更加了100多万人。在未来，现实地讲，在未来20或30年内，这一数字会达到360万。中国也不能免俗，中国的人口平均年龄为，女性75岁、男性70岁。目前，中国也有很多人在长期护理计划的范围内。中国面临着许多问题，这是一孩政策的结果。孔家哲学推崇长子养老。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一户家庭只有一个儿子或女儿。年轻一辈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人要养二老，有时还需赡养祖辈。可想而知，在未来20或30年后，中国家庭会更为分散，步上西方国家的后尘。

记者：欧盟或全球化对这一情形有何作用，是缓解还是恶化？如何作用？

Arno Bokeloh: 对于全球化，各人有各人看法，在我看来，这是欧洲改善经济形势的一个好机会。当然，全球化也有不好的一面，但我认为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我认为，欧洲的情形就是某种全球化。欧洲有内部市场，50年前，每个国家自扫门前雪，如今我们能够自由出口。而全球化能帮助我们缓解问题。德国与许多成员国签订了协议，比如，关于进出口和税收。而对待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我们需要十分谨慎，必须坚守我国标准。

Michael Schmidt: 这是谈判问题，而非策略问题。我完全同意阿诺的观点。

记者：全球化使得问题解决过程牵涉多方主体，而欧盟也无法再置身事外，那么欧盟应该如何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尤其是亚洲，打交道呢？

Arno Bokeloh: 我认为欧盟已经与世界其他地区多次交涉，首先就是与中国签订了社会保障协议。

Michael Schmidt: 正如你所知，中国已与韩国和德国签订了社会保障协议。与德国的协议签订于2001年。VW（大众汽车）在中国设有工厂，如果该

公司要往中国派遣员工，通常，该员工既要向德国社保制度纳税，也要向中国社保制度纳税。可是纳双份税有点不可理喻。如今，根据该协议，该员工仅需向中国制度纳税。此外，根据该协议，德国将许多专家和学者纳入了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这让我们引以为傲，如果中国需要就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征求一些意见，那么德国可以派专家去往中国。当前的亚洲，尤其是中国，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背景中。协同与合作，而非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欧洲和中国的互动及合作将会稳步增加

记者：CHEUNG Choy-Fun



Niels Thygesen

于丹麦经济事务部工作，并于哥本哈根大学担任副教授一职。他先后担任马来西亚财政领域的经济顾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货币部部长。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他后来成为哥本哈根名誉教授、丹斯克银行（Danske Bank）国际经济教授。

「中国经济的大幅增长将在未来引发巨变。中国不再仅仅关注于低成本经济部门，而同时也开始改善人力资本和研发部门。」

记者：在2013年，您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货币研究所（IMI），并发表了一个演讲。您在当时谈到欧元的问题，并提到现在需要就其采取一些措施。您是否可以向我们简要阐述下该话题？您是否认为在两年后的现在，其情况已经改善了呢？是否有什么变化？

Niels Thygesen：今天，我可以和你简要地谈谈我在2013年所做的事情。自从那时候起，发生了很多事情，而一直都存在的问题是，其结果将是什么？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我一直保持某种形式的乐观心态。我想，欧盟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在欧洲的问题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特别是在金融问题上。我们现在拥有银行业联盟，而这意味着会在欧盟施行一些安

全规定，而在这个领域内，在政治方面是非常困难的。此外，当前存在集中发生在希腊的危机。如果观察一下两年前的例子，当时好几个国家都处于危机中，这个问题将会更加清楚。所有这些国家都幸运地重新回归到了市场中，除了塞浦路斯共和国。西班牙已经避免陷入真正的危机中。希腊现在仍然是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将会是什么，但是希腊很可能将会一直处于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在政治上，将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可以被解决。而在经济上，如果脱离欧盟，那么对希腊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而我们其他人将会承受这些结果，但是并不必然是一场灾难。

记者：您也在香港INET（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做了主题为“欧元区货币制度：是欧盟的催化剂还是破坏球？”的演讲。您对这个话题持有什么观点？若要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您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Niels Thygesen：是的，我也在2013年来到了位于香港的INET（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当时处于较大的悲观主义情绪中。在那次出差中，我也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我不认为现在那个所谓的破坏球还存在。情况已经改变了，而且我认为，并且同时也看到，欧盟和中国在一起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在欧盟所面临的一个新情况是，乌克兰危机，以及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这是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与此同时，我们尚未准备好解决方案，不过至少我们看起来好像准备好面对该挑战了。同时，这必须是欧洲共同的问题。对共同对外政策的关注已经增加了，而这也反应在了欧盟成员解决其经济问题的能力上。

记者：根据我的研究，我发现您在丹麦还参加关于国际经济和欧盟一体化的研讨会。您对亚洲的发展是如何看待的？特别是在国际化和全球化成为亚洲快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的背景下，亚洲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有多大？它究竟是一个快速还是缓慢的进程？

Niels Thygesen：当然了，亚洲经济与欧洲经济相比，前者发展得更加快速。“一般的”欧洲国家每年增长1-2%。而在中国，经济仍然保持每年7%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不再基于对相对低技术水平劳动力雇佣的增长——而几乎

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来自于更高的生产率。当然了，其他国家想要在中国投资，并在新的经济部门中获得更高的生产力发展。这同时也应当增加亚洲的重要服务。我认为，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经济将会增长，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将资本从传统产业中转移到私营部门，而私营部门中有很多极具希望的新技术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增长。我认为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继续保持经济的增长。而中国的一些经济部门和地区将与世界经济在金融方面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效率。对于将会出现的资本流入，则无需加以限制，并且该资本流入还可以被用于支持高投资率。你不能说“亚洲经济”增长那么快，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依赖于全球市场的。但是，东南亚国家现在发展的很不错，同时印度也变得更加重要，尽管其起点很低。总而言之，需要区别对待亚洲国家之间的不同情况。

记者：您认为基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欧洲的公司和组织会在将来出现什么趋势？中国是增值链的国际化进程中最重要力量之一。这是否是欧洲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否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原因？

Niels Thygesen：关于这个问题，我所看到的欧洲国家的趋势就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工业和贸易以及投资部门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于欧洲因素。我认为，一些国家已经非常成功地融入了中国的经济。德国可能是其中主要的国家。他们有很多企业集团在生产用于中国发展的投资品。中国和德国的关系非常好，并且德国经济也很稳定。我昨天在北京跟丹麦驻华大使共进了午餐。他谈到，丹麦是唯一一个在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方面做得跟德国一样成功的欧洲国家。我们的很多重要公司在中国的表现也很抢眼：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挑战等方面便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丹麦在中国的这些领域内有很强影响力。中国在很多领域被视为高效率的生产商；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各种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但这一因素得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很多欧洲公司由于中国国内消费增长的原因而正在向中国供应商品。所以欧洲企业将会继续来中国发展，而相对优势的公司将会努力雇佣高素质的中国员工。中国人民所接受的教育质量越来越高。人力资本很高，因为现在中国的其他资源有更高的优先级，并且人力资本正在以比我们在欧

洲所能观察到的更高的速度在增长。

记者：特别是在亚洲和欧洲国家之间的沟通壁垒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而企业必须要克服这个障碍才能高效地合作。同时，文化差异也引起了各种问题。您自己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您认为，这两大洲之间的互动会引起很多问题，还是说，文化和语言壁垒很容易克服？

Niels Thygesen：沟通和语言障碍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在去上海之前，我在北京停留了几天，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员俱乐部，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的一流大学，且该大学国际化程度最高，有很多外国客座教授。但是，即使在那里，那些员工并不怎么会说英语。学生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讲英语，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对中国人来说，英语发音是很困难的。当然了，跟我们学习汉语的困难程度是一样的。但是，我在上海论坛遇见一些从丹麦来的朋友，并和他们共进了午餐，他们现在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他们几年前开始学习汉语，而现在他们的汉语很流利；在语言上进行大量投入显然是值得的。除此以外，我认为文化差异并不是很重要。中国人民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显然，他们有很好的幽默感，而且，他们也有着良好的好奇心；即使在由于语言的原因而导致他们并不是非常理解对方的时候，他们仍然尝试理解，并能快速地把握住语境。

记者：中国正在扩大研发部门（R&D），并且不再仅仅关注于低成本的制造业。特别的是，中国的人力资本这几年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您是否认可中国对全球创新和技术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力？

Niels Thygesen：这个问题很好地反映了我所要说的。中国不再仅仅关注于低成本产业，而是关注于高附加值产业。质量已经得到了提升，而且，我认为中国是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在高科技领域做的非常成功的中国企业。并且，针对吴教授在今天早上做的关于金融和技术的演讲，中国人在将现代技术整合进手机这方面的成就，非常有趣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我们经常说，中国人需要变得更加有创造力，而他们已经在非常迅速地朝这个方向转变。

城市创新：向人力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转变

记者：张昕蕊



王小军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系及中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终身教授）。致力于研究货币经济学和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及教育回报等课题。

「 我们发现在2000年至2005年，上海和北京两个地区在国内首次出现了由物质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向人力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的转变；而在2005年至2010年，不仅上海和北京的这种新发展趋势更加明显，天津也开始出现这样的趋势。这种转变是非常重要的，与我们的子论坛主题“创新”的联系也非常密切。」

记者：此次上海论坛您参与的子论坛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创新型国家建设”，而我知道您多年来致力于中国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能详细谈谈您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工作对创新国家建设的启示吗？

王小军：最近一些年来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呼声愈来愈高，而转型意味着经济发展模式由物质资本密集型模式（Physical Capital Intensive）向人力资本密集型模式（Human Capital Intensive）的过渡。现在中国国内各类政策规划、经济研究对于国内人力资本因素越来越关注，怎么实现对于人力资本的

准确有效衡量就成为了一个比较迫切的问题。传统方法对中国人力资本的测算过于粗糙的。传统方法一般会选取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平均的受教育年限、高中生毕业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或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等指标，而这些指标既没有对基数庞大的人口按照不同地域、年龄、性别、城乡等重要属性进行分类，也不能与收入水平建立令人信服的联系。

为了得到更加科学的人力资本指数，从2008年开始，我参加了由李海峥教授主持的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建。中央财经大学的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有一个标志性的、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即中国人力资本指数的测量指标与体系构建。该项目采用收入法对中国的人力资本进行定量测算。收入法是Jorgenson和Fraumeni等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新的测算方法。与传统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有很大不同的是，收入法以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为切入口，并且对数据的要求比较宽松从而便于实际采纳。

记者：那么收入法在原理和具体操作上和传统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王小军：收入法的原理其实很简单。这里我们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做一个比较，比如，我们要如何估算一台机器的价值？不难想到的一种方法是估算出这台机器未来产生的收入，把它们按照一定的比率贴现到现在，得到一个现值。同样的方法对于人力资本也是成立的。一个普通人，比如我作为个体的人力资本是多少呢？就是将我退休之前所有可预期的未来收入折算成现值。

记者：具体而言，要怎样估算一个人的未来收入呢？

王小军：我们采用的是年龄收入理论（Age Earnings Profile），这个是人口经济学中应用的很多的一个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可以对每个年龄的工资有一个估算值。最终模型的输入端用到的数据即是每一个省、在每一个教育层面的人口数量，外加上宏观上的一个经济增长率，一个折现率（discount rate）。为了保证模型的正确建立与运行，央财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聘请了收入法的创始人、国际知名学者Fraumeni作为技术顾问。

正如我刚刚说的，这个测算的关键是，所有的数据都需要分省、分年龄、分受教育程度、分性别、分城乡进行归类整理，所以工作量极大。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获取了全国1985-2009年、涵盖28个省的时间序列数据，现在在省的层面上已基本形成了面板数据。这个过程中，我的前两届学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困难很多，我们做的东西是别人没有做过的，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记者：用这个系统预测出来的人力资本的指标，会和现实调查出来的做一个对照吗？

王小军：我们整个项目不涉及调查，全部采用已有数据。人口方面，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宏观数据，而这些均是国家统计局免费提供的。当然，我们也需要收入的微观数据，这些主要来源于现有数据库，比如CHIPS，我们将这些微观数据适当处理后用于构建年龄收入模型，所以说将宏微观数据结合是我们项目的特色之一。另外，由于我们的人力资本指数是排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实际值而不是名义值，因而在时间上是可比的。我们还对不同地区进行了价格调整，因此测算值在空间上也是可比的——这个特点就比较稀缺了，这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采纳我们的成果。

记者：那么对于每年测算得到的人力资本指标，有没有进一步的分析和结论呢？

王小军：当然有，我们每年都会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公布一份研报，其中涵盖了对不同省份数据的比较、时间序列的趋势分析以及与物质资本的对比分析、与地区GDP指标的对比等等，我们会得到一些省市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模式（Human Capital Intensive），另一些则是物质资本密集型模式（Physical Capital Intensive）。对于同一个省份，比如河北省，我们也会分别得到其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率（Accumulation Rate），再做一个对比分析。

记者：对于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积累率，这些年来有没有出现一些明显的变化趋势？

王小军：有的。我们发现，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省份还是更加注重物质资本的积累，而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比较忽略的。截至2000年，我们国家主要的经济发展动力还停留在物质资本的积累，而2000年之后有意思的转变出现了。我们发现在2000年至2005年，上海和北京两座城市出现了由物质资本密集型模式向人力资本密集型模式的转变，而在2005年至2010年间，上海和北京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主的特征更为突出，另一座城市，天津，也开始出现这样的趋势（我所做的人力资本指数的研究是以5年为研究阶段的）。在我自己做的一张图上你会看到，上海和北京自2000年起表现出明显的左移的趋势，2005年后天津也开始左移。但遗憾的是，其他的省市还维持着右移的趋势，即是说它们还延续着物质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模式。这就说明，在我们国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已经开始了向人力资本密集发展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是非常重要的，与我们的子论坛主题“创新”的联系也非常密切。谈到创新，其实最重要的也就是高级人力资本的积累。我一开始进行数据的分析研究的时候没有预想到这样的结果，后来发现这个结果很有意思，很适合于本届论坛，尤其是我们所属的panel的进一步讨论。

记者：您提到的上海、北京等地的“左移”，会不会是以其他地区的“右移”为代价的呢？

王小军：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这与我的另外一个研究思路相关。比如说，我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安徽省、江西省距离江苏、上海、浙江这样经济发达的地区地理上并不是很远，但是它们却没有能借上后者的力，这是为什么呢？这其中涉及到人才流失（brain drain）和人才红利（brain gain）的问题。尤其明显的是安徽和上海的关系，许多安徽省的人才离开安徽去了上海，对于安徽省来说这无疑是严重的人才流失，而对上海而言则是一种人才红利，这种情况很常见。如果我们看受教育水平，直觉上一座大城市的外来移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应该是低于城市本地居民的，但是我通过对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在北京、天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是这样的，在其他地区却并不一定如此。打个比方，由湖南到湖北的移民（这里是缺乏数据支持的），大部分移入的移民的受教育水平其实是高于本地居民的，这和我们在大城市

看到的现象是刚好相反的，这样一来人才流失和人才红利对于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的影响就很难说了。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进一步的研究，只有一些比较粗糙的初步结果，今后我打算针对这一个问题写一个working paper。我个人也对研究结果抱有很大的兴趣。

R2P的维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记者：仇晟栋



Colin Wight

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他的研究兴趣源于他热衷于探索国际关系理论的碎片化性质，并将对其的理解认识运用于范围更广的知识与公开辩论之中。他对政治暴力的各个方面都很感兴趣，目前在进行有关恐怖主义、暴力与国家为主题的书籍的编写工作。



Toni Erskine

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副主任（政治与伦理学）。她目前是国际美国研究协会理事会的当选成员（2014-2016），并且在执行委员会任职（2014-2015）。目前她正在做一个项目，项目对作为全球政治道德责任承担者的正式组织（包括国家机构、跨国公司、政府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进行审查。

「R2P是国际范围内认可的一套国际原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主权的看法。外界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凭借主权利为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贡献一份力。」

记者:什么是“R2P”?为什么在道德责任方面多次强调“保护责任”而非法律责任(有时也强调法律责任)?

Toni Erskine: R2P指的是国家保护责任,它是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所达成的共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09年报告中对其作出了详细阐述,它有三大平等“支柱”:

(1) 东道国的职责是保护国人免受种族灭绝、战争罪行、反人类罪和种族清洗。

(2) 国际社会的职责是协助东道国履行其基本责任。

(3) 国际社会的职责是在东道国“明显不能”保护好其公民的情况下(尤其是当其未能保护公民免受上述四种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能够“及时果断地”做出共同回应。回应方式包括和解与强制两种手段;当非军事回应不见成效时才可考虑使用强制手段,且根据2005年达成的共识,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绝对不可以采取强制手段。2009年这一共识得到详细阐述,强制手段与和解手段相同,都被当作一种责任。

Colin Wight: 我同意以上说法,但是我的回答会与她的稍有不同。我认为R2P是国际范围内认可的一套国际原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主权的看法。理论上,R2P规定了国家须承担保护其公民的职责,同时也规定了在本国或东道国无法履行其职责的情况下,体系内的国家须承担保护其他国家公民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承担该国的相应责任。这种职责是否属于责任,这是一个难题。

Toni Erskine: 让我们谈谈第二个问题。回顾那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R2P的所有文件,包括《2009履行保护责任》(2009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2005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2005 *World Summit Outcome*)

Document)中的第138段和第139段，以及干涉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在2001年的重要报告，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件中存在这样一个普遍的理解，即国际社会的成员有道德责任来针对严重的侵犯人权来采取行动。我想，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责任作为基本人权的理论的必然结论而出现。对于这两者的基本假设前提是我们都有着共同的人性。有一些特定的事情我们不能让其发生在我们的人类同胞身上。换句话说，这些观点有着非常强烈的世界性的道德情感作为其基础。如果你注意一下学者们，包括James Patterson, Jennifer Welsh 和 Edward Luck，他们都将R2P作为一项道德责任来进行探讨。实际上，潘基文已经宣称，在2005共识中列出的R2P代表着项“道德律令”。

从法定保护责任的方面来进行讨论的困难可能是R2P的法律地位目前尚无共识。一些学者（尽管存在争议）认为，在发生大规模暴行的特定情况下，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强制干预也是合法的；而另外一些学者（持相反观点）则坚持认为，上述强制干预即使获得安理会授权仍然是非法的。关于R2P是一项道德责任的断言是因为允许种族屠杀、种族清洗、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发生是令人发指的。法律责任的表述迅速地引出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哪些特定的保护弱势人群的方法既符合正确的授权又符合国家主权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观点，并且还引出了国际法本身的地位问题。

Colin Wight: 这些都是很好的观点，我完全赞同。我想要说的是，尽管其始于道德问题，然而当其涉及到了安理会后，这便成为了一个法律问题。一旦涉及到安理会，事情就进入到了一个更加正式的框架中，超越了其原来的道德律令范畴。所以，你将此作为一项道德问题，并且将其纳入到一个更加结构化和程式化的框架中。问题是，所有的安理会决议都可以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论辩。法律本身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即使是国内法律也同样需要司法解释，并不存在不需要司法解释的法律，所有的法官也都需要解释法律。所有的法律都有其司法解释，因为法律是用语言表达的。当你获得安理会批准后，可以确定的是，安理会成员有法定义务来保证遵守决议。若没有决议没有得到遵守，则你就是将联合国系统的合法性抛之脑后了。

记者: Colin Wight教授，您提到这涉及了主权问题。尽管如此，中国坚持不干涉原则。您将就此问题向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什么建议？

Colin Wight: 我想，中国的关切是合理的。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关切。有很多国家有着同样的关切。所有的国家都想要保证他们的自主权，或者是不干涉原则。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允许一国干预另外一国的的事物来阻止侵犯人权。问题是，国际体系历经发展，而不干预的准则已经成为了国际体系发展中的固有准则，并且R2P看起来威胁到了上述准则。目前，这还不是很大的威胁，因为其仍然依赖于安理会批准。基本上，由于安理会的组织方式，像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他们想要，是可以坚持不干涉原则并行使其否决权的。**Toni**和我所关心的是，如果国际社会已经确定了保护的责任，如果联合国安理会不愿意承担该责任而你无法确定哪个代理人或代理人集团将要来承担该责任的时候，该怎么办？对于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以卢旺达为例。多数人在回顾卢旺达的时候都会说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失败了。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一些行动的。R2P就是发源于这个失败的例子。人们想要知道，为什么那就发生了，并且还想要知道为什么国际社会失败了。人们想要设立一系列的结构、流程和程序来阻止在将来再发生那样的事情。国际体系的问题是，如果联合国说不，那么谁将来阻止另外一个卢旺达的惨剧的发生。当你寻求安理会的帮助，如果安理会说不，那么法律意义上你就无权进行干涉，但是你仍可能保有道德权利。

Toni Erskine: 在Colin非常棒的观点上继续说：不是只有中国对未经合意的军事干预十分谨慎。回到我们刚才所讨论的2005世界首脑峰会共识，实际上，是美国代表John Bolton在讨论的最后阶段引入了对谈判的额外需求，并反对当东道国明显无法保护其本国人民的时候使用与强制反应措施有关的“责任”这个词。在之前的草案中，联合国成员国接受了“共同责任”来采取集体行动，包括在第七章的规定下，在当地国没有履行其保护弱势族群免于受到大规模暴行伤害的责任的时候。尽管如此，由于Bolton的反对，关于强制干预的责任这个词的表述被弱化了，并且变成了国际社会“愿意”在“具体问题的基础上”采取集体行动。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中国绝不是唯一一个对参与未经合意的强制干预的责任持有不同意见的国家。

记者：R2P的讨论中包含了恐怖主义了吗？为什么？

Colin Wight: 没有。恐怖主义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目前在国际体系中有将近122种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共识。这完全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恐怖主义，如果你像我一样将其定义的很窄，那么它就不会被归入大规模暴行、种族屠杀、战争罪或其他R2P类别。如果你问一个人世界上有多少恐怖主义，那你首先需要问他\她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什么。有一些学者将国家所做的所有事情都定义为恐怖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就有很多的恐怖主义了。而我持相反的观点，并且我认为我们应该将恐怖主义定义得狭隘些。按照我的观点，世界上并没有太多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并没有对人权或人类福祉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以至于需要我们在R2P的框架下来对其进行处理。恐怖主义对于我来说是个次要问题。由吸烟而导致死亡的人数要远比因恐怖主义而死亡的人数多多了。

记者: 在过去一些年里，亚洲遭受了几次严重的恐怖袭击，例如在2004年和2010年发生在俄罗斯的车臣恐怖袭击，和2014年在中国西南部城市云南发生的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对于这些事件，您认为宗教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这些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

Colin Wight: 关于恐怖主义的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问题是有人试图总结其本质。例如，**Scott Atran**，一位资深的人类学家，就认为宗教在当代的恐怖主义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的观点是，驱动那些人的不是宗教而是神圣价值。基本上，他认为，纳粹有神圣价值，苏联有神圣价值，西方有神圣价值（民主和自由主义），而我们所为止奋斗的就是所谓的神圣价值。我认为，这只是一个语义上的差别。我认为，宗教很明显地在当代恐怖主义中起到很到的作用，但是宗教也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没有任何社会现象是单一的因果关系形成的。原因并不仅仅只有一个。肯定存在一个原因，导致那些人被伊斯兰极端组织所吸引。这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有关系。所以，我想要说的是，宗教起到了作用，但是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然而如果说宗教并没有起作用的话，那就是愚蠢的。

记者: 亚洲地区组织（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在亚洲的维和行动和安全治

理方面超越了国际干预了吗？

Toni Erskine: 一般来说，地区组织对R2P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例如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对于此，有下述两个原因：

(1)地区组织一般对危机发生当地的情况有更好的理解，包括其历史、政策和文化。因此其（经常）能够更好地在受到大规模暴行威胁的人群之间建立信任。

(2)第二，相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地区组织还有更高的合法性。当我们在讨论R2P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论是地区组织作为被我称为“自愿的外包联盟”（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或“自愿的治安维护者联盟”（没有获得上述授权而行动）中的一部分的情况下，还是，当地区组织作为自主独立的行动者的时候。

在R2P的背景下，我认为，地区组织的参与由于上述两个原因而变得非常重要。（我应当注意到，我理解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明确表示反对以保护人权为借口对其成员国事务进行干预，例如在第2条能力建设和第3条民主中）。

Colin Wight: 我认为在当今世界，不论您是在讨论R2P还是反恐，您都需要在所有层面采取的行动。您需要在地方层面、地区层面和国际层面采取行动。仅仅将今天的这些问题放在国内处理是不可能的。地区组织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您能够获得一个地方解决方案，那就很好了。如果你无法获得地方解决方案，那么就向地区寻求帮助，然后向国际社会寻求帮助。但是，地区解决方案的性质需要被明确。而这就提出了地区组织的合法性和能力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有时候，你需要建立在国际层面上的法律框架，然而地区层面却是能力所在的层面。

记者: 因此，您一定程度上同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峰会上的发言，也就是，亚洲的安全需要有亚洲人民来保护？

Toni Erskine: 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有一个限定条件。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网。当亚洲使用严格的排他性原则来保护自己的时候，会使得它在需要外

部帮助的时候无法获取相应的救援。若在特定情况下，地区（任何地区）内的人民不再受到保护，该怎么办呢？有人可能会提出有力的论证，认为地区在保护其相应人民方面承担主要责任。尽管如此，这并不能成为最终的结论。地区合作非常重要，并且，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地区组织在保护弱势群体时候往往在有效性和外部合法性方面做得很好。尽管如此，如果地区行动者们不愿意或不能提供保护，那么，在特定的紧急情况下，必须有从外部获得帮助的可能性。

对于我来说，由此而得出，强化地区组织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例如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就非洲联盟组织章程第4(h)条中规定在出现种族屠杀、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情况下可以对成员国进行武装干预的可能性。现在重要的是推动能力建设，这样的话，该地区组织就能够真正在那些紧急情况下采取行动了。

Colin Wight: 我刚刚正想要在那个问题上提到非洲。对于我来说，人们应当始终用最好的方式来解决。人们首先会倾向于在地方层面解决问题，然后是地区层面，然后是国际层面，但是这三方实际上必须是相互合作的。地区解决方案肯定是较为合适的，但是有时候，人们确实是要面对一个能力的问题。不得不说，我认为非洲解决其自身问题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非洲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限制。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由于殖民等等。

记者: Colin Wight教授，您在您的演讲中提到，中国的R2P战略清晰，但是不可持续。这是为什么呢？您将给中国这个新兴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在R2P方面提出哪些建议？

Colin Wight: 我对于中国当前状态的可持续性的关切来源于那句名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想，人们对之产生误解的一件事情是，美国，作为一个社会，一般是反对军事行动的。这看起来是与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截然相反的。美国看起来在全世界所有地方都进行着干预。但是在越战之后，普遍存在着反对美国介入大型外国冲突的情绪。911事件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在911事件之后，我认为，任何一个遭受到那样袭击的超级大国都会采取一些行动的。入侵阿富汗对我来说还算是合理的。而入侵伊拉克则完全是一个错

误。我已经研究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了。我在入侵伊拉克这个问题上看不到一点合理性：石油，个人关系，入侵伊拉克从我的角度看完全没有一点意义。问题是，即使是在入侵伊拉克之后，美国公众开始对美国海外军事干预非常担心。问题是，当像是卢旺达那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公众，而这回可以说是全球公众，确实是对领导人施压要求他们采取一些行动。那么，现在美国就在承受着这样的压力，压力来自于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想要在出现冲突和侵犯人权的时候由美国领导来应对。美国并不太愿意做这些。

我认为，在俄罗斯和中国宣布他们将在意图针对叙利亚境内的化学武器采取行动的表决中投否决票的时候，奥巴马非常高兴。在那个沙漠国家中划下了红线之后，他认为阿萨德不会逾越红线。在很大程度上，奥巴马处于一个左右为难的困境中。他宣布了红线的存在，而这就意味着当红线被逾越的时候他需要采取行动。当俄罗斯和中国宣布他们不会支持的时候，实际上让他摆脱了困境。他并不是真的想要采取行动。他并不想把更多的美国军队送到美国并没有重大利益的状况中。中国所要面对的问题是，在中国崛起的时候，并且在更多类似情况出现的时候，中国也同样要承担为谋求国际社会的福祉而不得不动用其力量的压力。全世界的人民都希望强国来管理国际体系。一旦中国被全面认可为一个强国，那么她将会承担在国际体系中解决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的压力。我想，长远来看，在未来，如果中国退出并宣称其将坚持不干涉的理念，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永远持续。部分问题在于主权的观念在变化。我不认为国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是主权的概念正在被削弱，而中国也是这个变化中的一部分。

理性看待“亚投行”背后的大国博弈

记者：韩政



邢广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曾获俄罗斯普希金奖章。

「“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平等、包容的平台，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美日与中国之间的大国博弈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应该被过分放大。我们应该相信，本着互利共赢、团结互助理念的“亚投行”不会因为个别国家的原因而影响其大局目标的实现。」

记者：我们知道乌克兰事件使得俄罗斯和美欧之间的紧张进一步加剧，而俄罗斯和欧洲多个大国都申请了加入“亚投行”，您认为它们之间的隔阂与冲突将对“亚投行”今后的运作与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邢广程：我认为这个影响是很小的。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积怨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背景，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地缘政治问题上有着较大的冲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无法合作。在“亚投行”这个开放、包容的平台上，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合作大于竞争，也就是说，欧洲大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积怨总体上不会影响“亚投行”今后的运作与发展。

记者：有媒体认为，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状况充满着各种不稳定的因素，资本实力不够雄厚，国内投资环境一直以来也广受诟病，在“亚投行”中很容易被边缘化。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邢广程：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尽管俄罗斯目前的经济不景气，资金实力也的确不能和中国以及欧洲大国相比，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在“亚投行”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一方面俄罗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有着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和矿产资源；另一方面，纵向上看，俄罗斯的经济总体上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在其2012年加入WTO之后，一直在不断调整其经济政策，改善经济环境，我们应当带着发展和长远的目光去看待俄罗斯的经济问题。总而言之，我还是相信俄罗斯会慢慢改变其国内经济环境。

记者：有人说，日本是否加入“亚投行”，对“亚投行”的影响都不大，中国不用在乎日本是否加入“亚投行”。您如何评价这种看法？

邢广程：我认为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去看。日本如果能加入“亚投行”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它没加入，也不会对“亚投行”的发展产生实质影响。“亚投行”作为一个已经有数十个国家加入的多边性国际组织，一个国家加入，并不会造成多大的消极影响。对于日本的选择我们应该表示理解，毕竟它需要考虑美国的态度，并在这当中权衡总体的利益得失。

尽管日本到目前为止没有加入“亚投行”这一事实不会影响“亚投行”自身大局目标的实现，但日本绝没有次要到中国可以不在乎它的选择。一方面是日本作为一个经济技术大国，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在诸多方面先进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水平都能对亚洲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牵头设立“亚投行”的理念就是希望所有的亚洲国家能够合作起来，共谋发展，日本单方面不加入显然不符合“亚投行”最理想的设计，也不符合中国起初的愿景。

记者：“亚投行”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不断走向强大、增强国际领导力的体现，你认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俄两国的政治关系将会朝怎么样的

方向发展？

邢广程：我认为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各领域的合作将会不断加强。

俄罗斯在其原先的“欧洲化”道路上屡屡碰壁，不得不考虑向东发展。这种战略转变将使其与中国在更多方面展开密切合作。从总的国际局势来看，两国将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与稳定、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进一步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我们应该带着积极的态度，用理性的思考，看待中俄两国的政治经济往来。

提升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是一个长远过程

记者：刘夕铭



杨翠红

现工作于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任国际投入产出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副理事长，《Economic System Research》、《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Complexity》等刊物编委。研究方向为投入占用产出技术、全球价值链、经济预测、宏观经济分析。

「加工贸易是我们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必然过程，但到目前为止我国更多是一种被动的参与，主要由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所以我国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末端是正常现象。现在很多行业的产品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呈现出上升趋势，单位贸易的增加值在普遍上升。但很多产业还是处于中低端，比如一些电子类产品，满世界都是“Made-in-China”，但主要的核心技术还是来自于发达经济体。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地位，不是短时期里能完成的过程。」

记者：现如今，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政府、学界、国际组织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您认为，当前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利益分配呈现怎样的景象？

杨翠红：亚太地区包含很多国家和经济体。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发展

中经济体，实际上它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世界的全貌。众多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广泛分布于价值链的各个位置。一些发达国家往往处于高端的位置。而我国虽然贸易规模很大，但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较大，缺乏核心技术，所以整体上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记者：我国应如何改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低端地位？

杨翠红：我国的加工贸易领域，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发展特别快。可以说加工贸易是我们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必然过程，但更多是一种被动的参与，主要受到跨国企业的主导。所以我国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末端是正常现象。现在很多行业的产品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呈现出上升趋势，单位贸易的增加值在普遍上升。但很多产业还是处于中低端，比如一些电子产品，虽然满世界都是“Made-in-China”，但核心技术还是来自发达经济体。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地位，不是短时期里能完成的过程。

我们要做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被动地参与，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改变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地位。通过自主研发，提升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在加工贸易出口中的比例。

另一方面，就是主动提升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比如现在很热门的“一带一路”，它的最终目标可能是形成一条或多条新的价值链，这个时候中国可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实际上就是一个主动提升价值链的过程。比如通过对外投资形成跨国企业，也有助于树立我们在价值链中的主导作用。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开始主动出击，我国的对外投资增长很快。通过建立自己的跨国企业，可以某种程度上形成自己主导的产品，从而提升自身在价值链中的位置。

记者：另一方面，您也曾经提出：“虽然加工贸易出口的增加值率偏低，但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的作用是多层面的，它对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发挥了并且还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加工贸易对我国在哪些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翠红：加工贸易的作用有着多个方面。首先，最直接的是拉动外向型

经济的增长，同时拉动就业增长。加工贸易带来的就业数字是可观的。

第二，也能够增强国内配套产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无形中的影响。

第三，技术水平可以逐渐得到提高，我们会引入技术设备，而这些技术设备需要操作人员，需要对其中的技术含量有所了解。这实际上有助于培养大批的高素质的外向型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虽然加工贸易出口最初是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比如服装的贴牌生产，相对比较低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例逐渐提升。实际上提高的不仅是某个行业的技术水平，而是多个行业整体的技术水平。

第四，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工贸易很大一部分是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的。有些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占了总加工贸易出口中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在整个加工贸易出口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外商投资的动机往往来源于对我们优势的看重，比如劳动力的优势。一方面，和其它发展中经济体相比，我们拥有相对来说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我们的劳动力成本较低。而在“引进来”之后，因为充分利用了劳动力，实际上加快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一些产业需要通过聚集，才能真正支撑加工贸易的发展，这对于产业的优化升级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发展到了某个阶段后，我们不会满足于只从事低端产品的生产。去年我去法国访问时，一位欧盟退休的前部长提出：“中国可能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比如一些服装和电子产品的品牌已经逐渐迈入了中高端，开始直接和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同类产品竞争，而不再像过去一样主要生产互补性的、发达经济体减少生产甚至于不再生产的产品。”这其实是对行业发展的提升。而这个竞争的过程，对提升全球价值链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记者：如您所说：“加工贸易带来的就业数字是庞大的。”这是否意味着，在贸易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对就业问题带来负面影响？

杨翠红：也不一定是负面影响，加工贸易的出口的确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但是从相比来看，加工贸易单位出口对于就业的拉动，其实远低于一般贸易出口的就业拉动，甚至不足于它的三分之一。所以说，在出口对总的就业的拉动上，加工贸易还不是主体。

分情景讨论，一种情景是加工贸易的结构进行了调整，随之而来的会是

一般贸易比重的上升，这里的挤出效应其实是正的。

另外一种情景是这样，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都属于货物贸易，而贸易结构的调整不仅仅是货物贸易结构的内部调整，还有服务贸易比重的变化。服务贸易的发展对就业的拉动，不仅高于加工贸易，而且远高于一般贸易。所以短期内可能会有负面影响，长远来看却并不见得。我们应当重视服务贸易的突出作用，尤其高附加值的服务项目的单位出口往往拉动更高的增加值。

记者：去年的时候，中国第一次把全球价值链议题引入APEC合作议程，贸易增加值统计这种全新的核算方法也越来越受关注，那么您认为这种核算方法相比传统的总量贸易统计，优势在哪里？

杨翠红：优势主要在于，能够更好的对于贸易优势、贸易规模和价值链的分布提供一个更清晰的图景。比如，我们目前的总出口中其实含有大量的进口，即包含其它经济体产品的价值，但在总值统计框架下，体现不出来哪些是本国的、哪些是其他经济体产品的价值，特别是对中国和印尼等加工贸易比重较高的国家，情况更为明显。但现在，如果运用贸易增加值来计算的话，你会知道，如果有一千美元的出口贸易额，可能只有六百美元属于我们，剩下的四百美元可能来自其它经济体。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而不是面对一个虚大的数字。

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方式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重要的衡量贸易规模的方法，比如一些机电产品的出口贸易额很大，但实际上能够带给我们的利润很少，如果不了解背后的具体数字，就很容易盲目乐观，这会左右对于产业政策的相关制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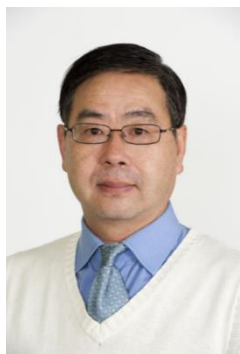
记者：去年5月APEC贸易部长会通过了《全球价值链中的APEC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您认为这对亚太地区，包括我国的相关研究工作能够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

杨翠红：这对研究工作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一直承担我国贸易增加值核算及相关议题的系统研究，我个人也参与其中。“战略框架”通过后，我们展开了切实的行动。前段时间，成立了核心

工作组，推动APEC贸易增加值相关数据库的构建。构建完成后会通过各种分析方法去研究APEC经济体之间的很多问题，包括经济联系、就业、碳排放的转移、能源消耗的转移等。共同完成这项工作需一个庞大的团队，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外汇管理局等机构均参与其中，同时也集合了一批优秀的研究者。另外，APEC部分经济体前些年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呈现下降趋势，通过考察时间序列的变动有助于分析经济联系下降的原因。而对于如何促进APEC经济体间有效的合作，数据库在未来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网络空间安全归根结底是军事安全

记者：左小雨



由冀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国防安全。

「随着网络信息化技术发展和深入，今后，网军和天军不仅仅是新型的作战力量，也将变成标准的作战力量，和传统空军海军并行。网络空间安全的扩展和军事转型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记者：“网络强军”是当今我们常提到的口号。网络能解决目前军事安全的大部分问题吗？

由冀：众所周知，网络是由军事需求的牵引而开始发展的。上世纪末，美国把军事网络通过市场逐渐向商业以及民用方面扩展，演变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见的革命性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规律，以至与人际交往最基本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的军事起源转化为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实际的应用。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尽管相较于网络的国防功能，今日其商业与民间用途更为广泛而且凸显，网络信息化的核心内容仍然是军事，网络安全的核心其实还是军事安全。如果没有可靠的国防网络的第一道防线，民间的网络就会非常脆弱，所以牢固的军事网络安全为民间网络安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网络长城。

记者：从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来看，要打赢“无硝烟的战争”，我国军事网络技术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由冀：我国的军事网络技术相较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的差距。最近十年，我国网络技术快速发展非常快，正逐渐缩小这一差距。军事网络技术的基础是民用的电子信息技术，我国军事网络技术相对滞后在一段时期里受累于国家整体电子工业和互联网技术的薄弱基础，因为网络技术最初都是从西方借鉴来的。而今通过大幅度的金钱和人力投入，我国现在的电子技术在国际上已经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虽然与美国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在某些重大领域，这些差距已经不是“代差”了。如果能做到小于“代差”，那么美国在军事网络能力上对其敌手的压倒性优势就可以逐渐削弱为相对优势，大国之间重大的战争冲突就可能因为技术上出现了相互确保摧毁的相对均势而得以抑制。因为如果大国之间没有压倒性的优势，那么在进行军事行为的时候就更要顾及行为的代价，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三思而后行。所以对中国来讲，保证国家安全最大化的捷径就是快速发展我们的非对称应敌能力，不仅仅是新一代飞机，潜艇等有形的作战平台，更重要的是拥有有效的无影无踪的战斗手段，其中包括军民兼容的互联网信息化进攻与防卫体系。最近五年，让美国人感到威胁的也正是中国在这有形与无形两方面能力的显著跃进。

记者：4月27日，中国首部网络空间安全蓝皮书《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发展报告（2015）》发布。联系我国成立国家网信小组、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双七战略等举措，您对我国网络空间治理顶层设计怎么看？

由冀：顶层设计和网络能力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相悖的概念。正如刚才我们所讲，中国军事网络能力快速崛起是基于民间电子工业能力的提升。这里存在一个本末的关系：没有民间电子工业的雄厚基础，军事网络技术的发展就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顶层设计和民间技术发展的辩证统一在于，民间基础性的电子工业化和信息产业发展是主体产业，市场导向，不可能成就于一个完美的顶层设计。而市场的横向竞争会推动主体的创新能力获得革命性突破，继而为军事网络信息化整体的跨越性发展安上羽翼。信息工

业发展为上层规划军事能力提供了选择性、现实性以及可能性。反之，军事网络信息化的自上而下的设计亦为民间主体产业设立更高的技术标准和要求，也从旁推动主体产业的跃升。因此这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强调在创新领域或民间领域，政府适量介入，让民间资本和创新能力有最大程度的发挥。另一方面把他们的创新转化为可实际应用的能力——无论是军事用途还是民间用途，也即把知识的力量转变为信息高科技的成果。没有技术能力，就没有顶层设计的基础。相反，没有顶层设计，直接的信息网络产品就很难转变为军事能力。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顶层设计非常重要，但是顶层设计设计不出创新力，也可能设计错，这是一个复杂的互动，需要精心的研究。

记者：民间技术力量该如何与顶层设计者进行沟通？

由冀：上海论坛做了很好的沟通。作为学者，我们大体上可以勾画出某种长期发展的趋势，尤其是惠志斌教授在论坛中关于大数据的主题发言，给政策制定者一个新的思路，新的灵感触发。政策制定者沿着国际前瞻性的发展预测，更能有的放矢，这就是上海论坛实质意义所在。很遗憾作为主体产业界代表的华为全球网络安全办公室代表没有来。民间力量和学界的结合是十分重要的。我的发言是一种前瞻性的预测，是相对的务虚，而惠志斌教授的大数据研究是更为具体化和操作化的内容，为大方向提供更为丰富，更为细致的填充物。论坛中的俄国学者和美国学者从国际的范围，从概念方面，进行框架性的描绘，最终落实到政府政策和对网络的治理上，包括政府内部网络系统治理和民间互联网互动的治理。这些发言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希望以后能更多地利用上海论坛的平台和业界进行沟通交流。

记者：全球网络空间秩序已从自发存在发展到自觉调整，站在网络空间治理的“转折点”上，可否谈谈您对未来全球网络空间秩序的预测？

由冀：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美国在当今网络世界空间力量占主导优势，如果他们要把技术优势造福于人类，那么全人类都受益。但是要是用于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击、压制和报复，就可能导致互联网技术进一步军事化，使国

家间关系更加紧张，而国与国之间的对峙很可能因为美国的网络霸权行径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原本相对缓和的冲突会因此升级为更加剧烈的冲突。例如论坛中讨论的美国人对六名解放军进行起诉的事件，明显不利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我们希望和平利用网络技术可以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准则，让其更好的服务于人类。

公共健康亟需公众参与

记者：田云茹



余宏杰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处长。兼任全球流感疫苗行动计划顾问组（GAP AG）成员、WHO 免疫策略专家咨询委员会（SAGE）流感疫苗专家组成员等职。

「在现在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背景下，人群移动很大，不可能阻断传染病的跨境流行。而且，单个病例的输入不可避免，只要及时捕获和救治，就不会对公共健康产生重大危害。我们担心的是输入性病例引起的本土的暴发。所以说我们不会把精力放在阻断少量散发的输入病例上，更重要的策略是阻断本土暴发。」

记者：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提到，埃博拉病毒在70年代就已经被发现，但由于商业利益疫苗研制一直没有进展。那么，您认为，关涉到公共健康的问题是否应该市场化？

余宏杰：疫苗的研发和商业的应用是两个概念。可以说，政府一直在指导疫苗的开发，疫苗的研发，包括埃博拉病毒疫苗的研发，以前都是美国政府主导的。

但是商业应用方面则是市场驱动型的，商业利益对疫苗研发的影响是肯

定的。如果疫情在很小范围流行的话，疫苗的需求也会相应较小。很多传染病，比如流感，在全世界范围内常年发生，所以疫苗的研制也比较成功。

疫苗的研发和临床之间有很大不同，临床使用之前要经历人体实验等步骤。埃博拉疫苗研发过程中，一直没有进行临床试验，因为临床试验的开展和暴发疫情的严重程度等有较大的关系。实际上，针对埃博拉的疫苗研发从1976年发现这种病毒就没有停止过，不过因为缺少商业利益，最终没有成功。如今，埃博拉疫情大规模暴发之后，临床试验也在加速进行，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

记者：公共健康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您之前提到，老年男性感染H7N9的可能性比其他人群要高，因为他们有去活禽市场的习惯。那么，传统的生活习惯对于一些流行病的干预是否有一些负面影响？

余宏杰：老年男性去活禽市场暴露的机会多一些，所以感染率也比较高。确实，特定的生活习惯和习俗会助长一些传染病的传播。比如中国人喜欢对活禽现杀现宰，强调食用时口感的新鲜度，而西非人喜欢在葬礼上触摸尸体，这些对传染病的暴发肯定是一种危险因素。因此，随着时间的进展，民众需要改变这些传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过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记者：您提到，近年秋冬季节仍然存在H7N9再度暴发的风险，而上海作为这种禽流感的重灾区，您是否有什么建议来对其进行干预？

余宏杰：其实上海已经做得很好了。从每年春节开始活禽市场会关闭，直到4月底才会重新开放，所以整个上海的发病也在减少。我们的建议是大城市应该逐渐地彻底取消活禽市场，抵制现吃现杀现宰的习惯，变成像北京那样的集中屠宰，这一点对H7N9的防治至关重要。

记者：刚刚的论坛中，姜庆五老师提到，港澳地区的疫情防治经验对我们会有些启发。事实上，在与广州地理环境相似的香港，登革热并没有

像前者一样大规模暴发，在您看来，其原因是什么？

余宏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尚不能完全回答，即为什么登革热去年在广州集中暴发，而没有在其他和广州有相似生态、人口、蚊媒的密度的地方暴发。从科学上来说，现在还没有完全能够解释，但我们相信是一个多因素作用的结果，肯定不是单个因素导致的。

记者：那现在可知的比较明显的因素是什么？

余宏杰：应该说蚊媒的密度和气候是主要的因素，尤其涉及到白纹伊蚊作为我国的主要传播媒介。与此相符，我们现在政策上的措施也主要是以蚊媒控制为主。不过，蚊媒控制需要多个层面的配合，虽然说政府主导多个层面的实施，但是落实政策需要个人参加。伊蚊是室内寄生的蚊虫，换句话说，主要生长在老百姓的家里。而南方的居民喜欢养殖花草树木鱼虫等等，因此室内的水渍里面很容易寄生蚊虫。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老百姓积极主动地去清除室内的寄生虫。当然，一些发放手册之类的宣传方式也在推行。

记者：您在刚刚的演讲中提到，如今有两个新的因素会影响公共安全。一个是人口密度的增加，另外一个变得频繁的远距离航空旅行。那么，如何有效地阻断输入性病例对我国公共卫生可能产生的影响？

余宏杰：在现在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背景下，人群移动很频繁，不可能阻断传染病的跨境的流行。而且，单个病例的输入不可避免，只要及时捕获和救治，就不会对公共健康产生重大危害。我们担心的是输入性病例引起的本土的暴发。比如，登革热是外国带来的，而随着时间气候温度蚊媒的密度成为实际的暴发条件的时候，引起了本地的暴发。所以说我们不会去阻断少量散发的输入病例，更重要的策略是阻断本土暴发，而不同的病例有不同的阻断策略。

塑造自由、理性、对话、共识的互联网舆论生态

记者：徐晔



张志安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传播与社会》（香港）、《新闻学研究》（台湾）论文评审。英国埃克赛特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政治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有新闻生产社会学、新闻从业者、新媒体与社会等。

「今天看来，我们的舆论场是存在结构性缺憾的，这种缺憾是多数网友并不围绕公共问题去讨论，而是围绕事件去表达自己情感化、非理性化的观点，这些表达主要是基于私利的动员，或者基于情感的判断，而非基于事实的理性思考。我们真正需要的表达是基于公共治理的分享和探讨，从而形成社会共识。」

记者：您如何评价目前我国的互联网治理策略理念与治理水平？有哪些进步与挑战？

张志安：我国现在高度重视互联网治理，在过去二十年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这是值得肯定的。

首先是管理权归属上的集中。就治理的主体而言，改变了过去九龙治水相对无序的格局。在过去，工信部、国务院新闻办、国家广电总局多头管理

互联网，管理效率总体不高。现在国家成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要管理权归为一个政府部门，而且这个政府部门又背靠一个更加重要的小组，即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既有高效的管理权又有一定的立法权，改变了过去“九龙治水”的格局。

其次是推动互联网的法治化。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也需要有规范和秩序。国家尤其重视网络传谣的治理，比如，对网络隐私和基本权利的保护，和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通过立法方式去推动网络管理法制化，这是进步之处。

目前的挑战在于当权力过于集中时，如何在行使权力时避免垄断化、行政化和集权化。另外，地方政府在实施网络法制化的过程中，出于社会维稳的压力，依然还有强烈的行政权力主导色彩。还有，尽管我们现在在推动网络立法，但依然有不少领域存在真空或执法困境。比如尽管强调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但具体实施过程中维权成本高，大部分人不愿意诉诸法律手段维权；尽管强调网络隐私保护，但依然有大量人肉搜索和基于网络的道德审判案例，依然对公民个人隐私进行轻易侵犯，要进行保护非常之难。

现在值得探讨的是在中国有否可能保护“被遗忘权”。2014年5月30日，谷歌面向欧洲用户推出一项服务，可以应用户的要求，将他们认为有异议的内容从搜索结果中删除。这项服务开通的4天之内，谷歌公司就收到了4.1万份个人申请。有了互联网、社交媒体，人们越来越多地处于“圆形监狱”当中。公众有否权利要求互联网公司“一键全删”，中国能否通过对“被遗忘权”的法律保护，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记者：有观点说，对于我国的互联网治理，我们大可依赖市场自身，建设服务型政府，您怎么看？还有人提出，要依靠各私营组织、行业组织充当治理的主体，您又如何看待这个模式？中国应该采用哪种模式？

张志安：不同国家的网络治理手段应当有所差别。中国现在需要探索的是共同参与。但是目前看来我国的治理模式仍然以政府为主导，公众的参与比较有限，企业在其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话语权还比较式微，社会组织的参与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国政府要逐步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尤其是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相关的政策，需要更多地从跟过去相对自上而下的、相对封闭的、相对权力主导的管理，走向更加开放、平等、多元、互动的治理的

方向。

中国可能无法简单套用某种模式，但中国应该采用更加法治化、公开化和治理化的模式，根据治理领域的不同来选择所依靠的主体。比如网络立法问题，基本是政府、人大牵头，但涉及到互联网政策、互联网产业发展政策的领域，应该充分地交给市场和企业。涉及到公民的信息和隐私保护，要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涉及到网络信息内容的道德标准，比如说网民素养，这应该交给社会。我们比较难的一部分是网络媒体的管理。因为在中国，媒体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网络媒体管理也相当程度上是纳入到传统媒体的管理制度当中来。

记者：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互联网舆论生态以健康地推进治理水平的完善？

张志安：充分自由的、理性的、可以进行公共对话的并且达成共识的舆论生态。这是中国社会朝前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互联网舆论空间和互联网舆论场，主要有三个标准。

第一，保障自由。让大家充分地敢说话，充分地围绕公共话题，敢于去表达，否则就不可能形成所谓意见的互动和大部分人对于公共事务的相对一致的看法。充分表达，让大家心无忌惮的表达是重要前提。

第二，公共对话、理性对话。这种表达不是你说我说，或者你在微信上说、我在微博上说，他在主流媒体上说，不是新闻联播里的官方舆论场和微博上的民间舆论场始终保持割裂，也不是微博上前十个人对微博进行了情感的表达影响了后面数以千计的人的言论，而是大家重新查看基本事实是什么，从而进行理性表达。如果不能互动，舆论场始终是各说各话，是极端的、情绪化的，大部分人的信息接触是选择性接触，舆论是极化的，这样很糟糕。

第三，形成共识。我们特别担心这个社会价值是撕裂的，大家的网络表达和讨论是“一地鸡毛”，最后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办法形成真正的社会共识，阻碍了治理按照理性的方向去发展。今天看来，我们的舆论场是存在结构性缺憾的，这种缺憾是多数网友并不围绕公共问题去讨论，而是围绕事件去表达自己情感化、非理性化的观点，这些表达主要是基于私利的动员，或者基于情感的判断，而非基于事实的理性思考。我们真正需要的表达是基

于公共治理的分享和探讨，从而形成社会共识。没有共识就无法真正为所谓的公共治理提供价值和观念的基础，所以今天中国的网络舆论场是不理性、不健康的。

我们要努力去推动达成共识，至少让精英达成共识是必要的。中国要形成这样的舆论生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性公民的成长和言论自由的保护，取决于严肃的媒体是否能够在舆论场当中生存和发展，成为重要的公共空间，还取决于教育和新一代年轻人的公民素养。

记者：国外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和机制可以供中国借鉴？

张志安：值得借鉴的是互联网治理要有一个整体性的战略安排。一个国家要对互联网治理形成整体的架构性的设计，要有一个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不同层面的安排。比如，具有整体战略部署的美国互联网国家治理体系，至少包括了三种能力：一是顶层设计能力，主要指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和制度设计；二是社会化能力，指建立起由政府、企业、智库、协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体系；三是协同化能力，指建立由其他公司和组织间信息交流、合作共享的机制。互联网治理是国家治理模式结构当中的一部分，二者是高度同构的。我们很少看到采取强权治理模式的政府，会对互联网采取开放的治理模式。

另外，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对公民的隐私和相关权利的保护，应该是所有关于互联网治理的基准线。治理不应该以牺牲正常公众的批评权和表达权为代价，更不应该忽略对公众的隐私、名誉和相关权利的保障。很多时候，公民隐私和国家安全之间会有一种矛盾，我们很容易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去影响对公民隐私的保护。二者之间的边界要清楚地处理明晰。

记者：在中国互联网治理中，上海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

张志安：上海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做了很多探索。比如，从网络舆论场的重构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舆论场的引导能力提升看，上海报业集团实施积极改革，推出澎湃新闻、上海观察等新媒体平台，让部分报刊退出市场，对新旧媒体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政府给严肃的主流媒体以行政支持，让其能够相对

从容地去做严肃新闻报道。这些努力都是塑造主流媒体在主流舆论场当中建立影响力、打通两个舆论场的积极尝试。

在智慧政务、移动政务方面，尤其是政府数据的开放方面，上海还可以做更多。很多欧美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政府数据频道，开放了和民生有关、不涉及个人隐私的公共数据，让公众可以更好地知道城市治理的关键信息和治理水平，这方面上海可以借鉴。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

地址：中国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 邮编：200433

电话：86-21-65642354 55664665 传真：86-21-55670203

电子邮箱：shanghaiforum@fudan.edu.cn 网址：www.shanghaiforum.org